

見與不見的戰爭

——論記體與賦體及劉裕北伐

劉苑如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六朝時期的文、筆分立，標誌著當時辨體意識的興起。這是奠基於文學創作與文學觀念的與時俱進，將作品從原本的生活實用層次提升到更深的文學自覺，也就是說，早期的文體常是某一種特定場合下的言說形式¹，比如「頌」為「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²，乃是祭祀場合告成的言說；或者「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³，意謂賦為士大夫在宴集場合朗誦的篇章；而「露布者，蓋露板不封，布諸視聽也」⁴，則是一種寫在旗面上的文字，可當作通報四方的旗幟，故被用以傳遞軍情，後來又被當作一種征討的檄文。在這樣的文體概念下，以「記」來「記識」，作為一種助其不忘的文字記錄，勢必起源甚早，用其名篇、題書的情況，也十分普遍，比如儒家有專門討論音樂理論

本文為科技部專題計畫「戴祚《西征記》之輯佚、考證與 GIS 地圖研究」成果之一。承蒙孫康宜院士、田曉菲教授與兩位匿名審稿人指正，謹致謝忱。

¹ 參見郭英德：〈論中國古代文體分類的生成方式〉，《學術研究》2005年第1期，頁122-127。

² 見〔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卷1之1，頁18b。

³ 見〔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34年），卷30〈藝文志〉，頁1755。

⁴ 今本劉勰《文心雕龍》卷四〈檄移〉作「或稱露布，播諸視聽也」（見〔梁〕劉勰撰，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卷4，頁377），然《太平御覽》卷五九七引《文心雕龍》則為「露布者，蓋露板不封，布諸視聽也」。見〔宋〕李昉等編：《太平御覽》（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年），卷597，頁2820b。

的專論〈樂記〉⁵，經部有王肅(195-256)注《喪服要記》一卷⁶、史部有題名為子貢(520-456 B.C.)作的《越絕記》⁷等。其共同特色就是維持一種散體獨立的文章形式，內容則或為議論，或為記敘，範圍非常廣闊，更重要的是用途各異，因此一直缺乏獨特的文體風格，也未能累積出足以構成一個類型典範的佳作⁸，故往往與別的文體混同，比如《文心雕龍》就是將「書記」合論，《文選》則將「奏記」連類，到了《唐文粹》才將「傳錄記事」視為一個文體分類。換言之，儘管六朝還沒有獨立的「記體」論述，但不表示沒有「記體」的創作實踐。

以紀行主題來說，隨著東晉、南北朝時期胡漢對峙的僵局逐漸化解，轉為時而興兵對戰，時而聘使交流的動態平衡，加速南來北往的行旅頻率，不僅出現大量的紀行詩、賦，更有不少記述從征、聘使行旅事蹟的「行記」產生，如《隋書·經籍志》史部地理類著錄的佚名《江表行記》、姚最(536-603)《序行記》、李繪(東魏)《魏聘使行記》、《李諧行記》、《封君義行記》等；更特別的是，其中一系列與宋武帝劉裕(363-422)相關的「征記」，就是由隨行人專門記述劉裕大軍，在東晉末年對南燕與後秦征行足跡的記錄。這樣的征記見於著錄者至少就有七部：包括裴松之(372-451)、徐齊民、孟奧、伏滔四家《北征記》、伍緝之《從征記》、邱淵之《征齊道里從征記》、郭緣生《述征記》、《續述征記》及戴祚《西征記》、《宋武北征記》等。可惜這些作品大多在宋以後亡佚，現在只能從他書的徵引中一窺其貌。唯有郭緣生與戴祚的作品被大量徵引於《水經注》、《太平寰宇記》等地志；《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唐宋類書亦能見其蹤影；魏晉南北朝的史註、政典和筆記小說亦收錄有相關內容，如是資料經由學者重新整理與輯佚，現今方可略窺其貌⁹。

⁵ 見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注疏》（《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卷37，頁662-637。

⁶ 見〔唐〕魏徵等：《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34年），卷32，頁920。

⁷ 同前註，卷33，頁959。

⁸ 劉勰《文心雕龍》在〈序志篇〉已經指出文體論的四大綱領為「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收入〔清〕嚴可均編：《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卷74，頁3307a。

⁹ 戴祚《西征記》、《北征記》輯佚最早見於〔明〕陶宗儀：《說郛》（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年），第3冊，卷4，頁7，然收錄簡略，各只收錄了四條；另外〔清〕王謨：《漢唐地理書鈔》（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總目中有「行役征途經涉地理書記」十六種。今學者最早輯佚者為森鹿三〈劉裕の北伐西征とその從軍紀行〉（《東洋史研究》第3卷第1號〔京都：東洋史研究會，1937年10月〕，頁28-39），收輯《西征記》與郭緣生《述征記》佚文，一併考證行軍路線；小尾郊一〈「征」記と「征」賦〉

有趣的是，這些作品記述的重點並非慘烈的戰爭圖像¹⁰，反而多為南北交通、風物景觀、博物傳說等記載，從今日的視角來閱讀，可以發現這些作品有別於六朝紀行詩、賦的過度用典，無論從資料性或可讀性，均留予學者諸多研究的空間：好比日本學者小尾郊一將劉裕北伐的系列作品，連同少部分桓溫北征書寫，從「紀行」角度比較征記與征賦的書寫特質¹¹；森鹿三從劉裕北伐西征的史實考察這些「從軍記行」¹²；李德輝則視其為從征交聘、南北文化交流的記錄，將這些記載由淮泗向西北直達關中旅程的作品，一律歸為「行記」¹³。三者都同樣發現：這些作品偏愛敘寫漢魏以來北方著名的名勝古蹟，以及廣泛流行的神話傳說，對於久陷異族統治的中原故土，表現出無限神往；森鹿三還注意到這類作品的大量出現，傳達江南漢族對劉裕功業的感激，同時藉此看出意圖保存劉氏受封為宋王，進而受禪成為宋太祖功業的種種記憶¹⁴。筆者則進一步從神聖地景的擇定，比較《西征記》與《述征記》兩者的政治意圖，若說作為一般軍行記的《述征記》，代表的是東晉大軍欲申「戀本之志」的立場，故而逐一報導華北戰場、歷史遺跡，以及風土人情；《西征記》則是有意識地遺漏晉五陵，另外選擇特定的墳冢、祠墓、靈祠和神廟等地景意象，著重於與當下時事的連結，重新組合有別於東晉臣民記憶中的一種華北空間，作為劉裕對彭城先祖的認同，以

（《中國文學に現われた自然と自然觀》〔東京：岩波書店，1962年〕，頁434-453），則將輯佚重點放在郭緣生的《述征記》與《續述征記》。目前已有中文譯本，更為方便，見邵毅平譯：〈「征」記與「征」賦〉，《中國文學中所表現的自然與自然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頁222-226；另外有鮑遠航的博士論文《〈水經注〉文獻學文學研究》（北京：首都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博士論文，2004年），亦曾考證《西征記》、《述征記》、伏滔《北征記》佚文（頁96-101、102-111、114-117）。近年李德輝從行記角度考察晉、唐、兩宋行記，見李德輝輯校：《晉唐兩宋行記輯校》（瀋陽：遼海出版社，2009年），頁42。筆者亦從二〇〇九年從事國科會計畫「文化拼圖：戴祚《西征記》之輯佚、考證與GIS地圖研究」，延續對中古文集輯佚的關注，以及行記文類的研究，並利用《西征記》中豐富的中古材料，結合GIS地圖影像資料庫技術，建立起劉裕西征後秦過程的動態地圖，並且提供一個當時南北交通與文化空間的資料庫。本文為該計畫成果之一，謹致謝忱。

¹⁰ 根據審查人提醒，中國征戰書寫傳統多捨棄戰爭實錄，早在周文史詩系列即已有「戰情省略」的特色，詳參楊牧：〈論一種英雄主義〉，《文學知識》（臺北：洪範書店，1986年），頁212-216。另外同樣論述亦可見楊牧：〈周文史詩〉，《隱喻與實現》（臺北：洪範書店，2010年），頁287-293。

¹¹ 參小尾郊一著，邵毅平譯：〈「征」記與「征」賦〉，頁213-226。

¹² 參森鹿三：〈劉裕の北伐西征とその從軍紀行〉，頁28-39。

¹³ 見李德輝：《唐代交通與文學》（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396。

¹⁴ 參森鹿三：〈劉裕の北伐西征とその從軍紀行〉，頁29。

及徐、兗地方意識崛起的文化象徵¹⁵。在此產生幾個問題：為何這些征賦、征記會突然地大量出現？為何又被大量地徵引？在辨體觀念清晰的六朝，這樣的文學現象應當如何解釋？其次，中國自古即有歷史久遠的征戰書寫傳統，這些作品既然是紀念功業之作，為何捨棄誇示軍威、武功的戰爭實錄，反而選擇描寫征途沿線的河流、關隘、城堡、古廟、要塞、古丘、古墳、碑刻、古樹，乃至於溝谷、坡阪、館驛等歷史記憶？原本的戰爭記載究竟是亡佚了？還是刻意的缺席？還有待從文學外部的歷史社會現象，以及該文體的本質、敘述筆法等內在邏輯進行釐清。

因此，本文的主要關懷有三：其一，有別於當代重「文」（如詩、賦）而輕「筆」的研究趨勢，這些征記不應僅被視為歷史地理著述，也是深有所托的寄寓之作，其文學的秘密就隱藏於「筆」法之中；其二，探討征記與「征賦」「名題化」的現象。在「征賦」名家輩出的時代，如謝靈運(385-433)的名篇〈撰征賦〉即是慰勞劉裕征秦之師所作，「征記」如何異軍突起，形成一種同題異類的「名題」，激發文人才華與競作熱情。這種文類的創意何在？能在前後諸作的書籍名單中，形成一個值得觀察的文學譜系；其三，徵引與輯佚的問題：這些征記既然能透過徵引，倖存於史籍或類書之中，本文將以《水經注》所引為例，探問此中是否發生了質變？最後擬用「戰爭之框」的概念來說明此一「定調」與「再定調」的形塑過程¹⁶，重新審視劉裕北伐戰爭的性質，思考戰爭如何從軍事

¹⁵ 見拙作：〈三靈眷屬：劉裕西征的神、聖地景書寫與解讀〉，劉石吉等主編：《旅遊文學與地景書寫》（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人文研究中心，2013年），頁29-70。

¹⁶ 本文受到汪宏倫於《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一書所提「戰爭之框」(frames of war)的啟發，但在使用上限於材料與範圍，只限討論人們對於戰爭認知的框架，並如何透過這個框架來賦予戰爭意義，進行詮釋與記憶。根據汪氏的分析，這個概念來自Judith Butler的*Frames of War* (2009)一書的感發，Butler利用英語frame一字兼其「框架」、「構陷」等多重意涵，界定「戰爭之框」為「選擇性地刻畫作為戰爭行為本質之經驗」的方式，從而構成一種感知生命的認識論架構。她以美國在伊拉克戰爭的虐囚照片為例，探討「戰爭之框」如何讓人們區分「可悲傷的」(grievable)與「不可悲傷的」(non-grievable)生命。Butler進一步借用此一比喻，探討包括性別政治在內的主體形成，哪些生命是被認為有價值的，而哪些生命是被刻意忽略，甚至不被認為有資格形成主體的。其次，根據Goffman的frame analysis，在任何社會中都存在著一些基本框架(primary frameworks)，人們必須透過這些基本框架來認識世界、理解當下，缺乏這些基本框架，世界將變得毫無意義可言。研究者者以此概念來連結微觀層次的個人心理動力與宏觀層次的政治機會結構，指出社會運動的參與者在投入社會運動時，必須透過框構(framing)的過程，賦予行動以意義。因此，框架並非一成不變，而是可以被「定調」與「再定調」(keying and rekeying)的。見汪宏倫主編：《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臺

進入符號象徵的領域，同時以實體與象徵兩種型式交戰。就是說，本文所謂「筆法」，乃是以書法為喻，重在探討如何選材、架構，以及技法背後的精神意態，與其說是關注「書寫」(writing) 問題，不如說更欲討論同一題材如何推陳出新，再次運用，又如何文學系譜中定位？從而深入瞭解推動文學的內在力量。征記、征賦在當時既成爲一種流行的文學體製，必然深契合於當時的文學與歷史情境，值得今人重新詮釋，並再發現其人文價值。

一、戰爭遺跡：劉裕北伐征記輯文的結構框架

劉裕自義熙元年(405)建義討伐桓玄成功後，曾經兩次揮師北上，討伐南燕與後秦，贏得百年難見的勝利，也留下《述征記》、《西征記》等一系列征記作品。令人意外的是，從現在遺留下來三百餘條的戰爭行記輯文中，即使採取廣義的戰爭書寫定義——就是不僅囊括行陣、戰鬥、軍旅、戰略、器械、工事、編制、軍禮、軍樂、戍守、勞役等武事記述；更包含田獵、巡狩、觀兵、講武等武德描寫；以及軍功頌揚、天命歸向等武功宣傳；乃至於戰禍帶來的民怨抒寫等等——這些征記中直接記載戰爭場面者，似乎不如預期的多。大部分被剪裁爲一個個塢、壘、營、固、關、漕等戰爭地景。《述征記》即曾解釋：「城而實中謂之『柁』，邱壘可阻謂之『固』。」¹⁷《續述征記》曰：「廣固城有大澗，甚廣，阻之爲固，謂之廣固。」¹⁸《西征記》亦曰：「函谷關城，路在谷中，深險如函，故以爲名。其中劣通，東西十五里，絕岸壁立，崖上柏林蔭谷中，殆不見日，關去長安四百里。」¹⁹《宋武北征記》曰：「少室山西有袁術固，可容十萬衆。一夫守隘，萬夫莫當。」²⁰這些戰爭要塞的遺文，不見得能夠看出與劉裕北伐的事跡相關。

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4年），頁165-167。

¹⁷ 本條原出《封氏聞見記》卷八〈姜里城〉。見〔唐〕封演撰，趙貞信校注：《封氏聞見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頁74；亦見〔宋〕王彥撰，周勛初校證：《唐語林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卷8，頁724。

¹⁸ 李昉等編：《太平御覽》，卷193，頁1060a。以下已經標出書名和卷數的同書引文僅標示頁數，不另外加註。

¹⁹ 見〔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卷6，頁158。以下已經標出書名和卷數的同書引文僅標示頁數，不另外加註。

²⁰ 同前註，卷5，頁133。



劉裕西征五條路線與時間軸（見「東亞文學與文化地圖」網站）

根據現今遺留的征記，檢選其中明顯與劉裕北伐敘述有關者，整理條列如下：

- (1a) 《水經注》卷二十六〈淄水〉引郭緣生《述征記》曰：
齊桓公冢在齊城南二十里，因山為墳。大冢東有女水，或云：齊桓公女冢在其上，故以名水也。女水導川東北流，甚有神焉，化隆則水生，政薄則津竭。燕建平六年 [405]，水忽暴竭，玄明惡之，寢病而亡。燕太上四年 [408]，女水又竭，慕容超惡之，燕祚遂淪。²¹
- (1b) 《太平御覽》卷五十九「水·下」引《述征記》曰：
臨淄牛山下有女水，齊人諺曰：世治則女水流，世亂則女水竭。慕容超時，乾涸彌載，及宋武北征而激洪流。（頁 413b）
- (2) 《水經注》卷二十三〈汭水〉引《續述征記》曰：
斜城東三里。晉義熙中，劉公遣周超之自彭城緣汭〔汭水〕故溝〔滾蕩渠〕，斬樹穿道七百餘里，以開水路。停薄于此，故茲塢〔黃蒿塢〕流稱矣。（頁 1965-1966）
- (3) 《元和郡縣圖志》卷十「桓公溝」引《宋武北征記》：

²¹ 見〔後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年），卷26，頁2241-2242。以下同書引文僅標示頁數，不另外加註。

桓公宣武，以太和四年 [369]，率眾平趙、魏時，遣冠軍將軍毛彪生鑿此溝，號曰桓公溝。于今四十九年 [417] 矣，溝已填塞，公遣寧朔將軍朱超更鑿石通之。（頁 270-271）

- (4) 《太平寰宇記》卷五「黃馬坂」引戴延之《西征記》云：
次前至黃馬坂，去計索渚十里。²²
- (5a) 《水經注》卷十五〈洛水〉引戴延之《西征記》曰：
塢在川南，因原爲塢，高一十餘丈。劉武王西入長安，舟師所保也。
（頁 1321）
- (5b) 《太平寰宇記》卷五「柏谷塢」則引戴延之《西征記》云：
塢在川南，因原爲塢，高數丈。在縣東北，姚洸部將趙元〔玄〕所守，
爲檀、王所破。（頁 74）
- (6a) 《太平御覽》卷八〇六「壁」引戴延之《西征記》曰：
宋公諮議王智，先停栢谷，遣騎送道人惠義，疏曰：「有金、壁之瑞，
公遣迎取。」軍次于嶠東，金、壁至，脩壇拜受之。（頁 3715）
- (6b) 又云：
冀州博陵郡王次寺道人法稱，告弟子普巖曰：「嵩高皇帝語吾，言江東
有劉將軍，是漢家苗裔，當受天命。吾以四十二壁、金一餅與之。壁數
是劉氏卜世之數也。」惠義以義熙十三年 [417] 入嵩高山，即得壁、金
獻焉。（頁 3715）
- (7) 《水經注》卷十六〈穀水〉引戴延之《西征記》云：
次至白超壘，去函谷十五里，築壘當大道，左右有山夾立，相去百餘
步，道從中出。此乃故關城，非所謂白超壘也。是壘在缺門東一十五
里。壘側舊有塢，故冶官所在。（頁 1368）
- (8) 《水經注》卷四〈河水〉引郭緣生《記》曰：
漢末之亂，魏武征韓遂、馬超，連兵此地。今際河之西，有曹公壘，道
東原上，云李典營。義熙十三年，王師曾據此壘。（頁 317-318）
- (9) 《水經注》卷四〈河水〉引《西征記》曰：
沿路逶迤，入函道六里，有舊城，城周百餘步，北臨大河，南對高山，

²² 見〔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卷5，頁73。以下已經標出書名和卷數的同書引文僅標示頁數，不另外加註。

姚氏置關以守峽。宋武王入長安，檀道濟、王鎮惡或據山爲營，或平地結壘，爲大小七營，濱帶河險。姚氏亦保據山原，陵阜之上，尚傳故跡矣。關之直北，隔河有層阜，巍然獨秀，孤峙河陽，世謂之風陵。戴延之之所謂風塹者也。南則河濱姚氏之營，與晉對岸。（頁 318-319）

上述《述征記》、《續述征記》、《宋武北征記》和《西征記》等書的輯文，分別從《水經注》、《元和郡縣圖志》、《太平寰宇記》、《太平御覽》等書輯出，前三者爲地理書，一般視爲《山海經》之遺緒，在劃界分疆的觀念下，立定中心之後，根據山、河，或人爲的郡縣爲經緯，逐步向外推展，分述其中的山河、城鎮、關塞、名勝、地方賢達、物產等等。其中常會涉及歷史沿革，從而引述他書內容，然擷取的文字通常不會太長。最後一部《太平御覽》爲政書，乃是以天、地、人所形成的世界網絡，採分類記事的方式進行編輯，在引書時常會加以改寫，使其成爲首尾具足的敘述。

由於古代書籍不加句讀，引文應如何斷句？終止於何處？常有爭議。譬如第五條「百（柏）谷塢」的記載，(5a)條《水經注·洛水》曰：「戴延之《西征記》曰：塢在川南，因原爲塢。劉武王西入長安，舟師所保也。」亦有學者認爲整句都是《西征記》的引文²³；而(5b)條《太平寰宇記》所引，止於位置、地勢的說明，並沒有提及劉武王事蹟，且在引文之後，又補充秦將姚洸（生卒年不詳）與晉軍檀道濟(337-436)、王鎮惡(373-418)等將領間的攻守事蹟。因此，輯文者一方面必須熟悉文本本身的文氣與句法；另一方面也得辨析引文者的用語習慣。筆者在上述引文上加了三種標誌：一爲行記關鍵字「次」字下的底線；一爲劉裕各種不同稱謂的方框；最後則是疑文字下的黑點。凡此不僅涉及材料來源的辨析，也關係到如何證成這些征記的文體特色與北伐戰爭的觀點與立場。

本節先嘗試經由上述戰爭文本中出現「次」至某地的條目，重建劉裕北伐戰爭的行旅蹤跡。行記文類基本建立於一段真實的旅程，從軍行記亦然，旅次的記載爲最基本的組件。根據李德輝研究指出，中古時期，戰爭與交聘南北交通的路線大體一致，主要有三條路線：一是長安→洛陽→陳留→淮泗→建康；二是鄴都→洛陽→淮河→建康；三是廣固→彭城→淮泗→建康。這三條路線自西向東延伸，蜿蜒于東部的平原區，衆多交聘使與從征從駕的文人就頻頻往返於這三條

²³ 李德輝輯校：《晉唐兩宋行記輯校》，頁 36。

道路²⁴。其中第一和第三條基本上可視為劉裕征伐後秦與南燕戰爭路線²⁵的簡化版，本文僅就北伐後秦之戰來說，實際上劉裕乃是以五路進攻，圖示如下²⁶：

東晉	義熙十三年			義熙十四年					
	8	9	10	1	2	4	7	8	9
劉裕、 朱超石	建康→	彭城→	淮→泗→清、濟→河→			畔城→洛陽→陝→	潼關→	蒲坂→	長安
王仲德	桓公潰→淮→泗→清、濟→河→滑臺→河西→								
沈林子	彭城→開封→倉垣→濟→河→			洛陽		陝城→河→襄邑堡→	匈奴堡→		
檀道濟	項城→新蔡→許昌→			洛陽		蒲坂→	潼關→		
王鎮惡	淮、泥		成皋→		宜陽→澠池→蠡城→		潼關→		河→渭→長安
沈田 子、傅弘 之	武關→丹水→						上洛→青泥→堯柳→藍田→長安		

劉裕西征路線圖

再與散見諸書中的佚文逐條排比後，可發現《西征記》主要是追隨劉裕主軍的路線：建康→廣陵→下邳→彭城（留縣）→沛郡（蕭縣）→山陽→宿預→下邳→彭城→金鄉→鉅野→碭碭→河→→洛陽→陝→潼關→蒲坂→鄭城→長安，沿途記錄下來的見聞，另外還摻雜了其他作為先鋒四軍的路線，如王鎮惡從淮淝出發，行經滎陽、宜陽、澠池、新安等地；或檀道濟從高平郡進兵陳留，攻下項城，得與王鎮惡呼應，前往滎陽；沈林子率水軍自汴水進入黃河，攻倉垣等；另外還有秦軍與晉軍對峙時的城鎮關隘，如金墉、鞏城、石關、蒲阪、定城、東原、大路、九原等。在劉裕主軍路線圖示中，建康於現存輯文中不見相關地景記載。

其中(2)和(3)條「漋蕩渠」、「桓公溝」的記載，涉及重要的戰略意義，由於東晉十六國時期，作戰軸線轉移，主戰場大多是在江淮、江漢之間的廣大地域。這一帶多為江河湖泊、丘陵盆地，地形條件不適合擅長野外馳騁的騎兵作戰，必須依靠水軍突破江河天險，實施戰略進攻，大規模軍隊移動和軍糧轉運也是借助於舟船。因此桓溫(312-373)曾鑿渠引鉅野澤和汶水入清水等航道修建工程，使晉朝水軍可從建康以東的京口沿水道而上，進入黃河²⁷；另外曹丕(187-

²⁴ 見李德輝：《唐代交通與文學》（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401。

²⁵ 東晉滅南燕之戰的歷史路線為：廣陵→山陽→下邳→琅琊→東莞→大硯山→臨朐→廣固。

²⁶ 見楊銘：〈論劉裕北伐後秦之戰及其歷史影響——魏晉十六國時期民族戰爭的個例研究〉，《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2期，頁49-52。該文指出劉裕北伐後秦之戰大抵以洛陽為分界的兩階段分兵進程。

²⁷ 有關此一背景的分析，詳參拙作：〈三靈眷屬：劉裕西征的神、聖地景書寫與解讀〉，頁36-37。

226) 南征東吳，即開石門引黃河由濟水入汝，潁水入淮，即是「蕩蕩渠」，《續述征記》稱之「汜故溝」。桓溫北伐枋頭之敗，即肇因於未開石門以通運，以致軍糧竭盡²⁸。是以劉裕北伐征記，留下許多水道記錄，如清河、穀水、泗水、武水、濟水、洛架、伊水等，亦是其重要的戰略布置，並且補充史書所未載者。

在上述十二條輯文中，其中(6a)、(7)、(8)、(9)條，即清楚留下行軍駐紮的地點：黃馬坂、柏谷塢、白超壘和曹公壘。其中黃馬坂位在緱氏縣西北十里²⁹，應是檀道濟率領晉師至成皋駐紮的地點，與趙玄據柏谷塢的秦師對峙處³⁰；柏谷塢在偃師縣南，又名百谷塢，左依洛水，右立高臺，地勢據險而成爲洛陽東南的門戶，兵家必爭之地。原本爲秦將趙玄（生卒年不詳）固守，在檀道濟的離間下，使後秦分兵各處，趙玄敗死後，轉由晉軍進駐³¹；白超壘又稱爲白超塢，位於新安縣西北十五里³²，則是王鎮惡進軍澗池，遣毛德祖(365-429)襲尹雅（生卒年不詳）於蠡城，鎮惡引兵逕前，與姚紹(?-417)率武衛姚鸞等步騎五萬相距於潼關的屯駐處³³；曹公壘位於潼關縣東北，根據史載，在晉師取得控制權後，由王敬先負責戍守³⁴。綜言之，在劉裕北伐後秦的戰爭中，他利用後秦內亂之際，採取多路進兵，遠交近攻的策略，使得後秦數面受敵，難以抵擋³⁵。其中最爲關鍵的兩場戰役即洛陽、長安的爭奪戰，前者從義熙十二年(416)八月發兵，到同年十月取洛陽，兩個月的時間攻陷了項城、新蔡、許昌、倉垣、漆丘、滑臺、陽城、成皋、滎陽、武牢等城，只有在柏谷塢受到頑強的抵抗，《晉書》即記載曰：

王師至成皋，征南姚洸時鎮洛陽，馳使請救。泓遣越騎校尉閻生率騎三千以赴之，武衛姚益男將步卒一萬助守洛陽，又遣征東、并州牧姚懿南屯陝津爲之聲援。洸部將趙玄說洸曰：「今寇逼已深，百姓駭懼，眾寡勢殊，難以應敵。宜攝諸戍兵士，固守金墉，以待京師之援，不可出戰。如脫不

²⁸ 見〔唐〕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98，頁2576。

²⁹ 參樂史：《太平寰宇記》，卷5，頁73。

³⁰ 參房玄齡等：《晉書》，卷119，頁3011-3012。

³¹ 同前註。

³² 參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5，頁142。

³³ 房玄齡等：《晉書》，卷119，頁3014。

³⁴ 同前註，卷48，頁1424。

³⁵ 詳見楊銘：〈論劉裕北伐後秦之戰及其歷史影響——魏晉十六國時期民族戰爭的個例研究〉，頁50-51。

捷，大事去矣。金墉既固，師無損敗，吳寇終不敢越金墉而西。困之於堅城之下，可以坐制其弊。」時洸司馬姚禹潛通於道濟，主簿閻恢、楊虔等皆禹之黨，嫉玄忠誠，咸共毀之，固勸洸出戰。洸從之，乃遣玄率精兵千餘南守柏谷塢，廣武石無諱東戍鞏城，以距王師。玄泣謂洸曰：「玄受三帝重恩，所守正死耳。但明公不用忠臣之言，為姦孽所誤，後必悔之，但無及耳。」會陽城及成皋、滎陽、武牢諸城悉降，道濟等長驅而至。無諱至石關，奔還。玄與晉將毛德祖戰于柏谷，以眾寡而敗，被瘡十餘，據地大呼。玄司馬騫鑿冒刃抱玄而泣，玄曰：「吾瘡已重，君宜速去。」鑿曰：「若將軍不濟，當與俱死，去將安之！」皆死於陣。姚禹踰城奔于王師。道濟進至洛陽，洸懼，遂降。時閻生至新安，益男至湖城，會洛陽已沒，遂留屯不進。³⁶

這段文字主要藉由趙玄的話語，分析秦、晉雙方局勢，做出合眾固守重要據點，以待其師老的策略，然而秦將領姚洸卻相信姦佞之言，罔顧忠言，依然分兵出戰，乃至節節敗退，最後趙玄只有戰至最後，與親信共同殉國。相較於之前，後秦固守大多望風歸附的平順，此一頑強抵抗也讓晉軍遷怒於四千戰俘，打算「戮以為京觀」，展開大規模的坑殺行動，後經檀道濟阻止，勸以「弔民伐罪」之師來收攏人心，果然產生正面的效果³⁷。

其後保衛長安的潼關等戰役，從義熙十三年(417)正月，王鎮惡由宜陽、灑池一路西進，檀道濟、沈林子(387-422)北渡黃河進攻蒲阪，蒲阪久攻不下，檀、沈二人只好放棄蒲阪，與王鎮惡兩路合軍一同攻取潼關，才於三月擊敗姚紹，使其退守定城據險。姚紹採用駐守河上，截斷晉軍糧道的策略，使得晉軍雖然屢敗襲擊的秦軍，卻陷入孤軍深入，苦戰對峙局勢。直到八月初，劉裕主軍擺脫北魏大軍的牽制前來，孤軍奮戰的情況才有所轉變。一開始朱超石(?-418)亦敗於蒲阪，王鎮惡乃謀繞過定城，率領水軍由黃河入渭水，與劉裕大軍夾擊秦軍，破東原、大路，逼向長安，使得姚難由香城撤軍回防，敗於涇上，姚贊棄定城、改守鄭城，姚譜守灞東，仍被晉軍一一擊破，後秦至此宣告覆亡。在《晉書》的記載中，描繪出此役的慘烈，其曰：

劉裕進據鄭城。泓使姚裕、尚書龐統屯兵宮中，姚洸屯于灃西，尚書姚白瓜徙四軍雜戶入長安，姚丕守渭橋，胡翼度屯石積，姚讚屯霸東，泓軍于

³⁶ 房玄齡等：《晉書》，卷119，頁3011-3012。

³⁷ 見〔梁〕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43，頁1342。

逍遙園。鎮惡夾渭進兵，破姚丕于渭橋。泓自逍遙園赴之，逼水地狹，因丕之敗，遂相踐而退。姚謏及前軍姚烈、左衛姚寶安、散騎王帛、建武姚進、揚威姚蚝、尚書右丞孫玄等皆死於陣，泓單馬還宮。鎮惡入自平朔門，泓與姚裕等數百騎出奔于石橋。讚聞泓之敗也，召將士告之，眾皆以刀擊地，攘袂大泣。胡翼度先與劉裕陰通，是日棄眾奔裕。讚夜率諸軍，將會泓于石橋，王師已固諸門，讚軍不得入，眾皆驚散。泓計無所出，謀欲降于裕。其子佛念，年十一，謂泓曰：「晉人將逞其欲，終必不全，願自裁決。」泓憮然不答。佛念遂登宮牆自投而死。泓將妻子詣壘門而降。讚率宗室子弟百餘人亦降于裕，裕盡殺之，餘宗遷于江南。送泓于建康市斬之，時年三十，在位二年。建康百里之內，草木皆燋死焉。³⁸

晉軍歷時三個月始攻陷潼關，之後遭遇秦軍固守奇襲，斷糧逼脅，如此激戰五個月，到了長安臨陷時，後秦重要將領不是戰死陣前，就是叛逃，最後姚主投降的下場，藉由幼齡世子佛念之口，預告無可回旋的結果。

相較於前述以人、事為重心的歷史敘述，今日所見的征記筆法，即是後來記行文慣用的書寫方式，是一種在時序下的空間表述，空間的展示建立於相對距離、方位的描寫，或以己身的位置為標準，或用兩地之間的相對位置為座標，再估計其間的距離、方位，具體呈顯出空間位置³⁹。如(7)條「白超壘」的輯文，即是十分標準的「在時序下空間關係」的記事，就是以晉師逐城推進的時間軸貫串整體記事，再以進駐的堡壘為對象，用函谷作為參考點，標示距離、地形，構成一種空間認知。在《水經注》中的這條引文，亦即字下標注黑點的部分，又延伸出此壘真實位置的歷史辨證，這部分應是酈道元的考證，而非征人行旅所能關注者⁴⁰。

³⁸ 房玄齡等：《晉書》，卷119，頁3017。

³⁹ 參大西陽子：〈南宋期の紀行文に於ける時空間表現をめぐって：表現行為としての記録〉，《お茶の水女子大學中國文學會報》第8號（東京：お茶の水女子大學中國文學會，1989年4月），頁36。

⁴⁰ 酈道元《水經注》中這類地理考證特別多，他在徵引劉裕北伐征記時，常加以辨證，如卷五〈河水〉曰：「……燕民謂是處為天橋津。東岸有故城，險帶長河。戴延之謂之遼明壘，周二十里，言遼明，石勒十八騎中之一，城因名焉。郭緣生曰：『城，袁紹時築。』皆非也。」（頁416）又卷十六〈穀水〉曰：「是水〔孝水〕在河南城西十餘里，故呂忱曰『孝水在河南郡』；而戴延之言『在函谷關西』，劉澄之又云『出檀山』，檀山在宜陽縣西，在穀水南，無南入之理。考尋茲說，當承緣生《述征》謬誌耳。緣生從戍行旅，征途訊訪，既非舊土，故無所究。」（頁1373）

那麼征人行旅究竟關注什麼呢？無乃出於戰略的需要，《水經注·洛水》即記載：「義熙中，劉公西入長安，舟師所屆，次于洛陽，命參軍戴延之與府舍人虞道元，即舟遡流，窮覽洛川，欲知水軍可至之處。」（頁 1296）凡此偵巡工作，在北伐的過程中，常為重要的戰略運用；其次如前行研究已指出，其與南人對於北方故國風土的好奇有關⁴¹；更進一步來說，人類進入陌生的環境時，習以身體與思維來丈量世界、認識世界，從而藉由對他者的認知確立主體的位置。因此，與其說那是一種科學性的真實理解，不如說是一種融合客觀條件下的主觀詮釋。是以其在記述長安爭奪戰時，如(8)條「曹公壘」、「李典營」的輯文，郭緣生就提及了魏武征韓遂、馬超戰役的典故，及其相關位置，將歷史濃縮於空間的命名；字下有黑點的部分則追憶義熙十三年晉師曾據守此壘。從此一條目的用詞來看，其稱晉師為「王師」，就是天子之師，理應出自劉裕從征之人的筆下。這種古今對照的筆法，不僅是一種歷史真實的疊合並置，也常有相互定義的作用，使劉裕西征與魏武事跡類比，引發某一種聯想。另外，戴延之在(9)條輯文，描述姚秦所守的曹公壘，包括逶迤的道路、函道的距離、舊城的大小，以及山河形勢。而字下有黑點的部分「宋武王入長安，檀道濟、王鎮惡或據山為營，或平地結壘，為大小七營，濱帶河險；姚氏亦保據山原，陵阜之上，尚傳故跡矣。關之直北，隔河有層阜，巍然獨秀，孤峙河陽」的記載，其中「姚氏亦保據山原」實與前文「姚氏置關以守峽」重複，後文應為前文的說明。

經由上述的觀察討論，可以發現征記與史傳體記事不同，無意從實際的人事記載以考歷史興衰、古今之變，而是一種由行旅次第串連而成的文類，這些戰爭輯文儘管受到引書的需要，特別是地理書的影響，常常被裁剪成一個個地名的考證形式，所幸藉由北伐蹤跡的考證，大致可以還原其基本架構，並經由記事類書的補充，保留史書未載的地方開發事跡。更重要的是，劉裕大軍經行的空間，並非只是一種實證性的位置 (location) 考察，而是融會了歷史與這些征人生命經驗形成的「地方」(place)。

二、行遠征伐：從征賦到征記的名題化

征記形成一種文體之前，「征行」書寫已早在詩、賦中常見，甚至形成一種

⁴¹ 前文已引述過小尾郊一、森鹿三和李德輝的相關研究。

名題。若說國家的基本元素在於土地、人民、政府與主權，中國古代的巡行制度正是確保土地與主權的重要策略。除了天子的巡狩之外，從先秦時期即有「風俗遣使」制度，兩漢時則有所謂「刺史行部」制度，在觀覽風俗之外，還肩負監察與存問地方的職責。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遣使巡行則由皇帝派遣信任的使臣出巡地方，突破早期採集歌謠、瞭解民情的職能，涵蓋考課、監察、賑恤、教化等多種影響國計民生的重要領域，成為國家職能機構的重要補充⁴²。這種巡行制度也成為當時士大夫行旅書寫的重要社會背景，早在《尚書》即記載舜繼位之後，即巡守四境，之後每五年一巡，羣后四朝，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對於不服的諸侯，刑當其罪⁴³；《詩經》則頌揚「周公東征，四國是皇」⁴⁴，肯定派遣師旅巡行、捍衛邊境的重要性。劉宋謝靈運曾著有多篇行旅賦，包括〈撰征賦〉、〈歸塗賦〉、〈嶺表賦〉和〈孝思賦〉等，他以豐富的閱讀與創作經驗，在〈歸塗賦〉中指出：

昔文章之士，多作行旅賦，或欣在觀國，或愴在斥徙，或述職邦邑，或羈役戎陣，事由於外，興不自己。⁴⁵

就是說，從「文」的角度觀察，行旅賦之所以廣受文士青睞，在於其所涵蓋的內容廣泛，從視察國情，受貶遭憂，朝廷述職，軍容戎務等，方便文人當作敘寫或抒情的題材，因應大部分文士寫作的欲望，因而造就了一時名題。

然而紀行之作實際以「征」命篇者，則是從兩漢之際才開始，小尾郊一曾將這些征賦分為兩組不同的類型：

首先是班彪(3-54)〈北征賦〉、曹大家(45-117)〈東征賦〉、潘岳(247-300)〈西征賦〉等紀行賦。在這一組作品中，〈北征賦〉開頭即曰：「余遭世之顛覆兮，罹填塞之厄災。舊室滅以丘墟兮，曾不得乎少留。遂奮袂以北征兮，超絕迹而遠遊。」⁴⁶言其身歷長安為赤眉軍兵禍所毀，不得不出逃至安定郡高平之事，

⁴² 參王東洋：〈魏晉南北朝巡行與考科關係探討〉，《河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5卷第6期（2007年12月），頁11-16。

⁴³ 見〔漢〕孔安國傳，孔穎達疏：《尚書正義》（《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卷3，頁38a-40b。

⁴⁴ 見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8之3，頁300a。

⁴⁵ 〔唐〕歐陽詢撰，汪紹楹校：《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卷27，頁494。

⁴⁶ 見〔漢〕班彪：〈北征賦〉，收入〔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卷9，頁426。

通篇敘寫途中見聞，在歷史與現實相交織的時空中，抒寫對人生遭際的感慨，表達對時事的評價；而〈東征賦〉的篇旨可見《文選注》引《流別論》曰「發洛至陳留，述所經歷也」⁴⁷，以寄寓對故土的眷戀和行旅艱辛的感慨，並藉由孔子困於匡，子路治理蒲城的功績等歷史故實，告誡其子要正身守道；再則〈西征賦〉見載於臧榮緒(415-488)的《晉書》，其曰：「岳爲長安令，作〈西征賦〉，述行歷，論所經人物山水也。」⁴⁸相較於東漢的征賦，此賦雖仍少不了敘寫沿途人物、土地的歷史變遷，但已經加入更多直白的山水描寫⁴⁹。除此之外，還有已佚的盧諶(285-351)〈征艱賦〉、張纘(499-549)〈南征賦〉等，從遺文看來亦是以征途爲線索，描述沿途所見與所感。由此看來，儘管這些賦大都被設定於大亂之後的背景，但「征」字在這樣的語境中，在「正行」的本義之外⁵⁰，應解釋爲「遠行」之義，基本上承續《楚辭》懷憂遠遊以遣懷的抒情模式，另增加直接描寫景物的筆法，藉由旅途實際所見所思，表現一己感時傷世之懷，可說是一種因地及史的紀行賦。就現存的文獻考察，相較於用「行」、「遊」、「羈」、「去」、「歸」等字爲紀行賦命篇，顯然漢魏六朝的作者們更偏向以「征」爲名，應該也是承襲自《楚辭》慣用征字，如「濟沅湘以南征兮」⁵¹、「溘埃風余上征」⁵²、「耀靈曄而西征」⁵³等，藉以表達一種具有楚地風情的遠行意象。

其次，還有一組數量更大的征記，已經在內容上直接與出兵行遠有關。小尾教授提及除袁宏(328-376)〈北征賦〉、〈東征賦〉之外，還有後漢崔駰(?-92)〈大將軍西征賦〉、應瑒(?-217)〈撰征賦〉、〈西征賦〉、曹丕(187-226)〈述征賦〉、王粲(177-217)〈初征賦〉和〈征思賦〉、繁欽(?-218)〈述征賦〉、〈征天山賦〉、徐幹(170-217)〈西征賦〉、阮瑀(165-212)〈紀征賦〉等等。其中以後漢崔駰〈大將軍西征賦〉爲最早可見者，作於竇憲(?-92)北鎮匈奴，西鎮涼州之際。根據研究指出，其時班固(32-92)、傅毅(47-90)、崔駰都在竇憲的幕

⁴⁷ 見〔漢〕曹大家：〈東征賦〉，收入同前註，卷9，頁432。

⁴⁸ 見〔晉〕潘岳：〈西征賦〉，收入同前註，卷10，頁439。

⁴⁹ 小尾郊一已經注意到這個變化，見小尾郊一著，邵毅平譯：〈「征」記與「征」賦〉，頁219。

⁵⁰ 《說文解字》曰：「延，正行也，從辵正聲。」見〔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洪葉文化事業公司，1999年），卷2下，頁7b。

⁵¹ 〔周〕屈原：〈離騷〉，見〔宋〕洪興祖撰，白化文等點校：《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卷1，頁20。

⁵² 同前註，頁26。

⁵³ 屈原：〈遠遊〉，同前註，卷5，頁165。

府，追隨其逐鹿北漠，馳騁西疆，乃在履艱制勝之際，藉由同題競作中相互激發，各展才華，共同創作一批反映邊塞軍旅生活的豪邁篇章。因此班固、傅毅也都有〈竇將軍北征頌〉，其中又以崔駰的文學創獲最為豐贍，作有〈大將軍西征賦〉、〈北征頌〉和〈大將軍臨洛觀賦〉等。內容上表現金戈鐵馬，鼓角鉦鳴，以頌美為主，兼及勸誡與感恩，彰顯出昂揚向上的進取精神與盛世氣象⁵⁴。事實上，這類征賦的出現，並非單一現象，數量甚至更高過小尾氏所舉，至少還有楊修(175-219)的〈出征賦〉、曹植(192-232)〈東征賦〉、陸雲(262-303)〈南征賦〉等。主要集中於三國時期，一般認為與當時強烈建功立業的意識有關。陸雲〈南征賦〉亦接續此一脈絡，其〈序〉云：「太安二年[303]秋八月，姦臣羊玄之、皇甫商，敢行稱亂，……大將軍敷命羣后，同恤社稷，……四方之會，眾以百萬，……粵十月，軍次于朝歌，講武治戎，以觀兵於殷墟。於是美義征之舉，壯師徒之盛，乃作〈南征賦〉，以揚匡霸之勳云爾。」⁵⁵賦文則標舉宇宙、沙漠、溟海、岱靈、狂飆等意象，鋪陳出熊羆之旅、虎鬪之將的英姿。

相較於上述的軍行征賦，袁宏的作品有其特殊性，一方面延續東漢以來頌美戰功的傳統，歌頌朝廷平定蘇峻(?-328)、祖約(?-330)亂軍而寫⁵⁶，另一方面則凸顯了獨特的時代性，《晉書·袁宏傳》曰：「〔宏〕累遷大司馬桓溫府記室。溫重其文筆，專綜書記。後為〈東征賦〉……從桓溫北征，作〈北征賦〉。」⁵⁷事實上，兩篇賦今已無完篇，創作的時間也不太確定，但從《世說新語·文學》第九十七條「袁宏始作〈東征賦〉，都不道陶公」一篇，劉孝標注引《續晉陽秋》記載則曰「宏為大司馬記室參軍，後為〈東征賦〉，悉稱過江諸名望……我決不及桓宣城」⁵⁸，兩者記載稍異，無論袁宏故意遺漏了誰，陶侃(259-334)之子陶範(胡奴)與桓彝(276-328)之子桓溫(312-373)，都必須挺身為父親的聲名爭取，凸顯當時名作流傳可能引發的社會騷動。《世說新語·文學》第九十二條又曰「桓宣武命袁彥伯作〈北征賦〉」，劉孝標注引《續晉陽秋》更明白記載袁

⁵⁴ 參劉德杰：〈論東漢外戚幕府文學的興起與繁榮〉，《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5期，頁43-48。

⁵⁵ 見〔晉〕陸雲撰，黃葵點校：《陸雲集》（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17。

⁵⁶ 參劉湘蘭：〈論賦的敘事性〉，《學術研究》2007年第6期，頁131-132。

⁵⁷ 房玄齡等：《晉書》，卷92，頁2391、2398。

⁵⁸ 〔劉宋〕劉義慶著，余嘉錫疏：《世說新語箋疏》（臺北：華正書局，1984年），頁274。

宏親隨桓溫北征鮮卑之後，桓溫命令他作〈北征賦〉，以歌頌其北征之壯舉⁵⁹。可見兩者應該仍可歸屬於軍行征賦，但從現存〈東征賦〉的片段為例，其曰：

惟吾生于末運，託一葉于鄧林，顧微軀之眇眇，若絕響之遺音。壯公瑾之明達，吐不世之奇策，挫百勝于崇朝，靡雲旗于赤壁。三光一舉而參分，四海指麾而中隔，過武昌呂逍遙，登樊山呂流眄，訪遺老呂證往，乃西鄂之舊縣。曩有吳之初基，升員丘而豹變。爾乃出桑洛，會通川，背彭澤，面長泉，洲渚迢遞，巖岫虛懸，卽雲似嶺，望水若天，日月出乎波中，雲霓生于浪間，嗟我行之彌留，跨晦朔之倏忽。風褰林而蕭瑟，雲出山而逢勃，驚瀾嶮嶮而嶽轉，積波崑崙呂嶺沒。若魚舟之小狹，衝奔流呂檣杙，擢弱楫之弗施，投洪流呂纖骨。已上六句從《御覽》七百七十補，又《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八引下四句。⁶⁰

此賦敘述征途中的山川景物和吳地的歷史名流，特別是歌詠周瑜在赤壁之戰中設下足以扭轉天下局勢的奇策，卻不見當下戰爭場面的敘寫，反而類似第一組的紀行賦書寫，或是已將兩種不同的類型融會於此，可惜其中對於諸賢稱許的部分都已遺佚，無從得知其如何追憶、評價這場戰爭的功過。凡此卻催促我們更進一步思考，山川地理、歷史遺跡，究竟只是一種過往的記憶？還是被賦予更多現世關懷，成爲一種不斷增生的話語？本文無法對此個案再深入探析，但將在後文從劉裕北伐書寫的角度，持續此一問題意識的追索。

從前述軍行征賦的分析，可知「征」已被引申爲一種長距離的征伐，寓含上對下，以有道伐無道的正義之師的意思⁶¹。其中曹植〈東征賦·序〉則曰：「建安十九年，王師東征吳寇，余典禁兵衛宮省。然神武一舉，東夷必克。想見振旅之盛，故作賦一篇。」⁶²儘管該賦並非曹植親身旅程的敘寫，而是以一種想像的軍容盛況，對照曹植受命留守的遺憾與無奈，其中「王師東征」中的「東征」究竟只是一個真實方位的標誌？還是一種具有象徵性的典故？一般來說，中文修辭

⁵⁹ 同前註，頁 270。

⁶⁰ [晉]袁宏：〈東征賦〉，收入嚴可均編：《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卷 167，頁 1785a。

⁶¹ 《孟子·盡心》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見[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卷 14 上，頁 248b。

⁶² [曹魏]曹植撰，趙幼文校注：〈東征賦·序〉，《曹植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 年），卷 1，頁 63。

中常有配字的用法，就是在單詞之上再加一個虛字，取其聲以舒緩語氣，並不實用其義，特別是以東西南北鑲嵌其間，往往只是語意的強化。然而曹操從建安十三年正月回到鄴城（今河北臨漳西南）後，即展開向南用兵的諸多準備；十九年七月再次出擊孫權，命曹植留守鄴，將孫吳稱之為「東夷」，應是借用「周公東征」的典故，將「征」的用法推向「帝王巡行」或「代巡」的高度。

小尾郊一教授的研究注意到漢魏六朝「征賦」與「征記」同題互文的跨文類現象。換言之，這樣的書寫不僅限於詩賦等「文」的創作，也反映在記體之「筆」類記錄之中，晉宋之間已有郭緣生《述征記》、《續述征記》，戴祚《西征記》、《宋武北征記》，裴松之、徐齊民、孟奧、伏滔四家《北征記》，伍緝之《從征記》，亦包括丘淵之《征齊道里記》等。他敏銳地指出，從名稱上看來，這些作品應該都是以南方建康為中心，展開北征和西征的記錄⁶³。這種「中心」的空間轉換，應該不僅是地理的描述，也包含一種南朝人士自我定位的空間表述。

由此可以進一步推知，戰爭至曹魏時期已經被前景化 (foregrounding)，成為作家一時競寫的「題目」，不再只是一種文學創作的大背景，東晉中後期再次受到作家親睽，創作的型態與寄託也更加複雜。這固然與當時的歷史現實有關，發動足以敘寫的戰爭，但更值得注意的是，無論這些作品的內容是頌美、感慨、歷史反思，或是寄寓批評，凡此都顯示出一場戰爭的性質與功過評價，似乎已經不是過去幾篇弔民伐罪的「檄文」，或是獎功罰罪的「詔書」就可以定義完成者。當然也不能由此簡單地推想，士大夫已經可以藉著創作左右這般「國之大事」，但最起碼我們必須經由征賦、征記名題化的現象，正視戰爭中文人奉旨隨行、同題共作，以及名作影響等的事實，並將其問題化，企圖解釋作家、作品在一場戰爭中可能扮演的角色。

三、征人騷客：記體與賦體中劉裕北伐記載的異趣

兩漢魏晉以後，隨著史類記文的蓬勃發展，《隋書·經籍志》共收錄史部著作一六三部，遠超過經部的二十三部，子部的二十六部。其中多集中在「雜傳」和「地理記」兩類，「雜傳」收有三十二部書籍，「地理記」收錄著作更是高達

⁶³ 小尾郊一著，邵毅平譯：〈「征」記與「征」賦〉，頁 216。

八十部。史部著作中以「記」名篇的比例增多，正可看出此時史學的興盛，從而回復記體的記事本意⁶⁴。在列於「雜傳」、「地理記」的諸多筆記中，保留若干劉裕北伐的相關記載，其中最常見者就是山川地理的記載與傳說。首先回到征記的討論，無論是《西征記》和《述征記》，都大量提及有關洛陽與長安的事蹟，故其成書應不早於義熙十三年(417)底，長安抵定之際。前文亦提及學者早已注意到其中含有東晉軍民「戀本之志」和旅人搜奇獵異的心態⁶⁵，以戴延之《西征記》為例，其曰：

檀山凡去洛城水道五百三十里，由新安、澠池、宜陽、三樂。三樂男女老劣未嘗見舡，既聞晉使溯流，皆相引蟻聚川側，俯仰傾笑。⁶⁶

這則記事本為戴延之等人奉命勘查洛水水道的記錄，另一方面則留下南方征人與中原人士兩種異文化接觸時，蔚為奇觀、俯仰大笑的情感反應。同書亦有以下記載，其言：

魚山臨河，神女智瓊與弦超會所。魏陳思王曹植嘗登此山，有終焉之志，遂葬其西，亦其所封國也。魚山在東阿縣東北。⁶⁷

分析這則魚山記載，依照慣例先從地理位置的描述開始，繼而指出當時流行的神人戀愛傳說與此山的地緣關係，然後才追溯此處正是陳思王曹植的封國所在，登此山而有終焉之志。舉此為例，不難看出，相對於前〈述征賦〉「因地及史」的書寫方式，征記毋寧採取一種「因地及事」的方式。這裏所謂「史」與「事」的差別，前者重在事蹟考證、歷史教訓和情感寄託，後者重在記述者本身對於地方知識、歷史傳說與鄉土趣味的探求，也就是從征人的眼光，報導北地的地理、歷史和風俗。然而「史」與「事」之間的界線，並非固定不動的，「事」的記載留予「史」的撰寫，不僅僅是材料，而是既具有事件本身的邏輯和意義，也可以轉化為別具意義的歷史詮釋。

其次，值得注意的則是南朝志怪記體中的武人意識，以及軍旅見聞。根據載錄，戴延之撰有志怪集《甄異記》，現存的十七則遺文，多為晉代流傳的鬼怪故事，表現出對於死亡世界的關注⁶⁸。當時與劉裕北伐戰爭最直接關係者，就是一

⁶⁴ 趙燕〈從敘事到議論——「記」體散文體制規範形成探析〉（《浙江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1卷第2期〔2012年6月〕，頁221）一文已經提出此一觀察。

⁶⁵ 小尾郊一著，邵毅平譯：〈「征」記與「征」賦〉，頁217。

⁶⁶ 見李昉等編：《太平御覽》，卷770，頁3544a。

⁶⁷ 同前註，卷42，頁333a。

⁶⁸ 詳見拙著：《身體·性別·階級——六朝志怪的常異論述與小說美學》（臺北：中央研究

些戰爭吉凶的故事。自古出師征戰前都要問卜，例如《述異記》即記載劉裕討伐南燕時問巫卜期之事，其曰：

義熙五年 [409]，宋武帝北討鮮卑，大勝，進圍廣固。軍中將佐乃遣使奉牲薦幣，謁岱嶽廟。有女巫秦氏、奉高人，同縣索氏之寡妻也，能降靈。宣教，言無虛唱。使者設禱，因訪克捷之期。秦氏乃稱神教曰：「天授英輔，神魔所擬，有征無戰；蕞爾小虜，不足制也。到來年二月五日，當剋。」如期，而三齊定焉。《廣記》二百八十三⁶⁹

在雙方僵持、對戰不止的伐燕戰爭中，女巫秦氏所傳的神教，不僅有答有驗，神準無比，同時在用語上也十分講究，將這場戰爭詮釋成「天授英輔」對「蕞爾小虜」的掃蕩，定義其為一場「有征無戰」的義戰，對於鼓舞軍心，振奮士氣，發揮絕佳的效果。另外，在《幽明錄》中一則以胡餅為徵祥的故事，則別具北方生活趣味，其曰：

姚泓叔父大將軍紹總司戎政，召胡僧問以休咎。僧乃以麪為大胡餅形，徑一丈。僧坐在上，先食正西，次食正北，《書鈔》引作東南次食正南，所餘，卷而吞之。訖，便起去，了無所言。已上亦見《書鈔》一百四十四是歲五月，楊盛大破姚軍於清水；九月，晉師北討，埽定潁洛，遂席卷豐鎬，生禽泓焉。《御覽》八百六十⁷⁰

這則由南人記載北方陣營求兆的故事，來源不詳，應與佛教異僧的神通傳說有關。在姚秦時期，從姚興(366-416)開始，就非常尊崇佛法，禮遇高僧，其中包括了僧伽提婆(365-384)、鳩羅摩什(334-413)、弗若多羅(305-404)、曇摩流支(生卒年不詳)、佛馱跋陀羅(359-429)等譯經大師，具有言事異能的僧人應也不少。但對於攸關國祚的預言，通常都是採取一種讖語的方式，不直接說破。儘管這些傳說，有徵有驗，對於南人來說，不過是一種後見之明，但是那種具有表演性質的象徵性預言，顯然還是沈澱為一種振奮人心的民族記憶。

由此可推知，在魏晉南北朝的軍旅生活中，巫者、術士和沙門等特異人士，顯然常會參與其間，提供卜筮吉凶、消災解禍，甚至在講經傳法活動中，傳播一些故事。另一方面，軍旅文人也熱衷於記錄種種志怪故事，自娛娛人之外，更重

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年），頁141-142。

⁶⁹ 見〔南齊〕祖沖之：《述異記》，收入魯迅：《古小說鈞沉》（香港：新藝出版社，1967年），頁171。標點已經筆者調整。

⁷⁰ 見劉義慶：《幽明錄》，收入同前註，頁283。標點已經筆者調整。

要的是，這些故事的流傳，為身涉異域的征人提供行動的合理性與必然性。

相對來說，在現存作品中最與劉裕北伐征記相關的征賦，非謝靈運〈撰征賦〉莫屬。《宋書·謝靈運傳》曰：「高祖伐長安，驃騎將軍道憐居守，版為諮議參軍，轉中書侍郎，又為世子中軍諮議，黃門侍郎。奉使慰勞高祖於彭城，作〈撰征賦〉。」⁷¹在〈撰征賦·序〉中，他首先指出晉室東遷後，長久承受不能匡復中原，致敬陵塋的恥辱，而將劉裕的戰爭北伐定義為一種「仰祗俯協，順天從兆，興止戈之師，躬暫勞之討」⁷²的義戰；其次描述劉裕軍容的壯盛，戰略高明，方能在短期內連戰皆捷，戰功彪炳。然另一方面，他描述受命往返彭城勞軍途中所見，不僅追尋江北的城邑、丘墳和古跡，更多著墨於對謝氏先祖藩鎮淮、徐遺跡的緬懷，以寄寓個人情志，並且期待「俾事運遷謝，託此不朽」（頁1744）。因此學者認為該賦不僅延續袁宏〈東征賦〉，既是一種因地及史，頌美戰功的紀行賦，同時表現出遊移在出處進退之間，藉由這些史地資料，彰顯謝氏家族的祖德門風⁷³，或則強調其在紛亂時代中思考個人的自處之道⁷⁴。另一方面，過去〈撰征賦〉的研究亦多探討謝靈運對於劉裕北伐的態度，而分別從晉室榮辱、國家統一、華夷之辨，甚至謝家祖德功業等角度，輔以謝氏的系列作品，如〈勸伐河北書〉之類，證明他對北伐持有一貫的明確思想⁷⁵。此外，亦有認為該賦透過回顧歷史，表達對劉裕將篡晉室的憂心，藉此宣揚「愛國主義」⁷⁶。事實上，所有的解讀都有其文本基礎和歷史依據，可得其一端，但本文更有興趣探究謝氏為何要藉由彰顯祖德門風，追思東吳，乃至於東晉歷史來詮釋這場戰爭？倘若「愛國主義」或「假意頌揚」都無法圓融或全面地解釋這樣的文本現象，那麼是否可以另闢蹊徑來解釋？更重要的是，這篇賦與劉裕北伐的系列征記有怎樣

⁷¹ 見沈約：《宋書》，卷67，頁1743。

⁷² 見〔劉宋〕謝靈運：〈撰征賦〉，見同前註，頁1744所引。以下引文同此，直接標注頁數，不再加註。

⁷³ 此說已見蘇瑞隆：〈論謝靈運的〈撰征賦〉〉，《文史哲》1990年第5期，頁48-52；鄭毓瑜：〈歸反的回音——地理論述與家國想像〉（《性別與家國——漢晉辭賦的楚騷論述》〔臺北：里仁書局，2000年〕，頁118-125）有更細膩的分析。

⁷⁴ 蘇瑞隆〈論謝靈運的〈撰征賦〉〉一文已提及（頁50-51），但陳恬儀深入發揮，認為〈撰征賦〉在字裏行間透露出未能在北伐事業中有所作為的遺憾與焦慮。見陳恬儀：《謝靈運仕隱曲折研究》（臺北：輔仁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08年），第2章，頁31-53。

⁷⁵ 陳恬儀：《謝靈運仕隱曲折研究》，頁54-60。

⁷⁶ 蘇瑞隆：〈論謝靈運的〈撰征賦〉〉，頁49。

的內在聯繫？

首先，還是得從〈撰征賦〉的創作時間談起。這篇賦的寫作年代，學者說法不一，或認為該賦應該作於謝靈運第一次北上彭城，慰勞劉裕大軍，就是如〈序〉所曰：「義熙十有二年 [415] 五月丁酉，敬戒九伐，申命六軍，治兵于京畿，次師于汜上。」（頁 1744）劉裕於其時出師，檀道濟、王鎮惡，以及王仲德 (339-438) 二軍隨即取得大捷，因此晉帝命謝靈運於義熙十二年十一月北上彭城，慰勞劉裕大軍，乃於次年 (417) 正月作此賦⁷⁷。再從內證來說，賦文曰「爾乃孟陬發節，……周雙七於此年」（頁 1753），是年既為閏七月，可見該年確為四一六年。蘇瑞隆則根據《宋書·武帝紀》「十四年正月壬戌，公至彭城」⁷⁸的記載，指出劉氏歸鎮彭城時，正值權力臻於頂峰之際，是年六月受相國宋公九錫之命，實乃篡位前兆，此時劉氏必躊躇滿志，正可對照出謝靈運的另一番心情，故斷言此賦應作於義熙十四年 (418) 或其後⁷⁹。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就是〈撰征賦·序〉所言「相國宋公，得一居貞」（頁 1744），古代稱謂有其禮制基礎，不能曲意變亂。故義熙十二年十一月，朝廷即策命劉裕為宋公，加九錫，謝靈運奉旨隨同宣詔史，十二月前往彭城勞軍，即跟傳達此一喜訊有關，是以本文應不早於義熙十三年春天，但是否可能更晚？則不無可能。劉裕雖然已在四一七年正月平定關、洛，但同年十一月，留守建康的劉穆之 (360-417) 驟逝，乃於十二月匆匆班師回京。次年，諸將內訌，關中大亂，賦云「嘉收功以垂世，嗟在嗣而覆旃」（頁 1749），是否指當年其子劉義真 (407-424) 鎮長安而潰敗逃歸事？賦末所言「願關、鄴之湔清，遲華鬢之凱旋」（頁 1753），是否已透露了此一北伐盛事的遺憾結局？亦大可玩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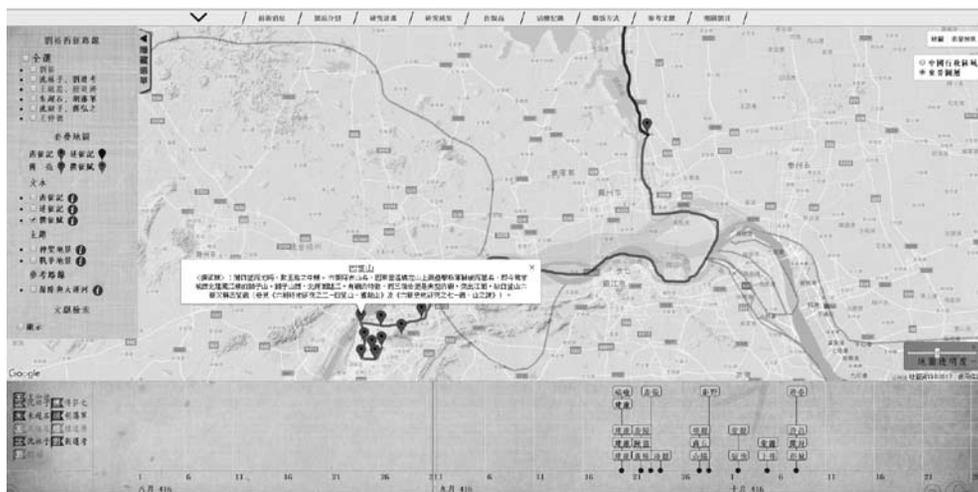
在上述的時空背景之下，再次重審賦文，謝氏沿著長江、淮、泗尋訪古蹟，歷經建康、石頭、廣陵、江都、下邳、彭城等歷史古都及兵家必爭之地，他在回顧歷史，選擇相關事蹟時究竟是否依循著某一種邏輯？首先從征途地點的敘述比例來說，該文幾乎未提及平關、洛事，而多集中在建康，應與他的行蹤原本就是限制於建康到彭城之間有關。其次，建康乃是東晉王朝國祚之所繫，緬今懷古必

⁷⁷ 顧紹柏《謝靈運集校注》所附之作品繫年，即將〈撰征賦〉一文繫於東晉義熙十三年，見謝靈運撰，顧紹柏校注：《謝靈運集校注》（臺北：里仁書局，2004年），頁 564；陳恬儀：《謝靈運仕隱曲折研究》，頁 32-44 則有更詳細的論證。

⁷⁸ 沈約：《宋書》，卷 2，頁 44。

⁷⁹ 蘇瑞隆：〈論謝靈運的〈撰征賦〉〉，頁 49。

離不開此。因此當他回望雒門、浮梁、鍾岩、查塘等，藉由建康皇城的景物，一面緬懷東漢光武帝中興，一面感慨王莽篡位導致漢室的凋零；從而回顧東晉的歷史，如何從風雨飄搖的局勢轉危為安，最後以提出善政作結；但若從詩賦對仗的書寫程式來看，未言之處或正與東晉天下的覬覦者有關吧。接下來冶城、石頭、四望、白石、落星等地，也是因地及史，敘及的史事皆不外興亡治亂之理，探討這些變動紛亂之中的各種人物，包括正面人物羊祜(221-278)、杜預(222-284)、周顛(269-322)、謝鯤(281-323)、溫嶠(288-329)等，亂臣賊子王敦(266-324)、蘇峻(?-328)、祖約(?-330)等，還有一些性格上有缺陷的大臣，如賈充(217-282)、庾亮(289-340)等人。這些人或乘時而起，建功立業，或犯錯失德，導致身滅家敗，甚至亡國。謝氏似乎有意藉由曹魏滅吳行動中，諸將爭功進讒的荒謬行為，以諷刺東晉諸將攻入長安後發生的內鬩。



〈撰征賦〉行跡圖

其次，另一個值得關注的重點，則是祖德追溯的問題，賦文並存謝氏與劉氏兩個家族的歷史。在謝氏家族方面，從序文開始，他由讚頌劉裕勤勉王室、軍容壯盛，聯想到自己祖父在彭城任藩，駐防淮陰、徐州一帶前線，保衛東晉免於傾覆的功績；行經廣陵，又頌揚太傅謝安(320-385)北府軍建軍的長策，最後卻選擇謙遜歸隱；又述及石梁溪孝子王祥祠，俯觀流水，追憶祖父謝玄(343-388)，緬懷其觀水測深的教導與安民濟群的功勳。另外，劉氏家族方面，出身微薄的劉裕塑造出一個高貴身分，稱其為「漢家苗裔」、「漢高帝弟楚元王交之後

也」⁸⁰，賦文也隨之附和，當他行進到汴水時，提及漢楚元王 (278-179 B.C.) 爲人中和純正，獎勵詩學；劉辟彊 (164-85 B.C.) 清淨寡欲，不欲做官；劉德 (?-57 B.C.) 爲人寬厚、樂善好施；劉向 (77-6 B.C.) 精通儒、道，直言敢諫；劉歆 (50 B.C.-23 A.D.) 雖陷於漩渦，但終能與王莽決裂。在歌詠兩個家族光榮的同時，較勁之意不言自明；然而更深一層的意義，則是強調持盈保泰、功成身退的重要性，方能長保家族命脈，也才能論及安定民生的德政。

從〈撰征賦〉創作的時機來說，原本就是頌揚劉裕西征告捷的喜悅，及其無與倫比的功績，謝氏卻將這樁深受東晉朝野期待的大事作爲背景，視爲追憶陳跡，頌揚祖德行旅的機緣；更自陳「遠感深慨，痛心殞涕」（頁 1744）的心情，痛陳歷史治亂，斥責亂臣賊子，還不時綿裏藏針，點出「紛征邁之淹留」（頁 1751），質疑劉裕久留彭城，一年不發兵的動機。賦的文體風格，原本就是「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⁸¹，謝氏「撰」征，表面上在鋪述「征行」，但更深一層意義，應採用《易經·繫辭下》「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⁸²的典故，亦即思考天地間變化的規律與定數。

綜合上述有關記與賦兩種文類中的劉裕征伐記事，正可發現兩種文體的異趣，前者既以「記識不忘」爲首要目標，往往取材多方，事涉紛雜，甚至觸及超自然力量，其訴求者既是現場中的參與者，也留予後世重新編輯、詮釋的空間；賦體雖也能就著「征」途極力發揮，但一般更看重其連結古今典故，以寄託諷喻，表達幽深的批判特點。兩者在東晉末年的劉裕北伐記事相遇，爲劉裕北伐賦予不同層次的書寫與詮釋，縱使無法證明其間的影響關係，但至少必須承認彼此之間形成一套各有偏重的論述模式。

四、筆下春秋：劉裕北伐書寫的筆法

前文初步討論征記文體的架構，以及征行書寫的發展與特色，在此基礎下檢驗征記佚文的敘事觀點，及其是否受到引書裁剪而改變敘事聲音？本節試從幾種不同來源記事的發聲位置，比較劉裕北伐戰爭記事中的稱謂變化，以及戰爭相關

⁸⁰ 沈約：《宋書》，卷 27，頁 784；卷 1，頁 1。

⁸¹ 劉勰撰，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卷 2，頁 134。

⁸² [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孔穎達疏：《周易注疏》（《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卷 8，頁 172a。

的用語差異。

首先，歸納上述征記輯文中的劉裕稱號，計有公、劉公、劉將軍、劉武王、宋公、宋武、宋武王等不同稱呼。根據史載，劉裕以平桓玄之功，進封使持節都督，揚、徐、兗、豫、青、冀、幽、并八州諸軍事、領軍將軍、徐州刺史；平南燕之後，屢封固讓，最後改授太尉中書監，尋領鎮西將軍豫州刺史，又領荊州刺史，加領南蠻校尉。繼而於義熙十二年(416)策命為宋公，加九錫。十三年，又以平姚泓(388-417)功進爵宋王，固讓。十四年為相國。恭帝即位，仍進爵宋王，元熙二年(420)六月受禪，改元永初(420-422)，在位三年，諡曰武皇帝，廟號高祖⁸³。若對照同一時期記載劉裕事蹟的文本，如：義熙七年(411)顧愷之〈祭牙文〉稱其為「錄尚書事豫章公裕」⁸⁴；義熙十二年(416)十月〈進劉裕為宋公詔〉、傅亮〈為宋公修張良廟教〉、〈為宋公修楚元王墓教〉、〈為宋公修復前漢諸陵教〉、〈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以及義熙十三年(417)春謝靈運〈撰征賦并序〉，傅亮〈策加宋公九錫文〉、〈進宋公爵為王詔〉等文獻中，劉裕則被稱之為「公」、「豫章公」、「太尉公」、「宋公」、「相國」或「相國宋公」⁸⁵；恭帝元熙二年(420)六月王韶之〈晉恭帝禪宋詔〉則稱之「相國宋王」；〈禪策〉稱之「宋王」。其中「公」原本是封建制度中一種爵位，如先秦時代的周公、毛公、晉文公、秦穆公等，後來為一種禮貌用語，如秦漢間的沛公、項公等，乃是以「公」為語幹，或加上姓氏，或者加上官銜、封地；中古時期的用法，又有新的發展，可用於官尊者稱官卑者，如安帝〈進劉裕為宋公詔〉言「公深秉大節，靈武靈震」⁸⁶，即是在上者的晉安帝稱下位者劉裕為公；又曰「太尉公命世天縱，齊聖廣淵」⁸⁷，則是在「公」上加「太尉」職稱。相國、王等稱，則是皇帝以下的最高權力，其時劉裕已派左長史王弘暗示朝廷為其加「九錫」，為篡位作準備，明顯有主弱臣強的意味。

⁸³ 見〔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卷118，頁3718。

⁸⁴ 見〔晉〕顧愷之：〈祭牙文〉，收入嚴可均編：《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卷135，頁2236b。

⁸⁵ 〔晉〕晉安帝（司馬德宗）：〈進劉裕為宋公詔〉，收入同前註，卷12，頁1530a-b；〔劉宋〕傅亮：〈為宋公修張良廟教〉、〈為宋公修楚元王墓教〉、〈為宋公修復前漢諸陵教〉、〈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收入同上書，卷26，頁2576b-2577a；謝靈運：〈撰征賦并序〉，收入同上書，卷30，頁2600b-2603b。

⁸⁶ 晉安帝：〈進劉裕為宋公詔〉，頁1530a。

⁸⁷ 同前註。

諡號為死後褒貶之名，楊伯峻《春秋左傳注》曾闡釋曰「諡，死後依其人之行事而賜名」⁸⁸；廟號是給已故皇帝立廟取的名號。從漢代開始，廟號都有「祖」字或「宗」字。「祖」稱開國皇帝，如太祖、高祖、世祖，「宗」稱以後嗣君，如太宗、世宗、德宗、英宗等。同時也可把國號加在廟號和諡號前面，就構成已故皇帝稱號的全稱，如「漢高祖」。是以入宋之後，劉裕身後的稱呼，則如顏延之(384-456)作於元嘉十八年(441)的〈赭白馬賦并序〉所言「我高祖之造宋也」⁸⁹，同時在《宋書》的敘事對話中，也多被宋人尊稱為「高祖」，只有在〈禮志〉、〈樂志〉、〈天文志〉、〈符瑞志〉、〈州郡志〉中，才用諡號「宋武帝」⁹⁰；相對來說，作為晉、宋敵對國北朝的歷史筆法，絕大部分直呼其名，只有〈天象志〉兩則記載保留「宋武」之稱。此後，齊、梁、陳等後繼的南朝政權，乃至於今，普遍使用「宋武帝」的稱號。

凡此不過是常識性的小問題，然而以此檢視現今可見的劉裕北伐征記輯文，發現其中時代、文類與其最接近，引證最頻繁者，就屬酈道元(ca. 470-527)的《水經注》(簡稱《酈注》)，該書基本上也是採用地理空間，繫以歷史、人文資料的編輯方式。由於酈氏在引證文獻之後，常會補充自己考證或者反駁的文字，特別是前面一種情形，脈絡一貫，文從字順，常造成一些輯佚操作上的困難。如何辨別酈氏與征記文字的不同，用語是一條重要的線索，特別是稱號的使用。誠如前節《酈注》所引征記輯文中即有稱「劉公」、「劉武王」、「宋武王」等不同的稱呼，其中「劉公」為一中性且普遍的稱呼，並沒有嚴格的時代限制，或可不列入討論。可怪的是既是稱「王」，就應該還未篡晉，何來有宋？又怎麼會與身後「武」之諡號合用？此必後出。

若更進一步檢索《酈注》，發現也有不少並未註明出處的劉裕北伐記載，應是酈氏自己的文字，在稱謂用語上似乎有其規律性。以南燕之戰來說，如有〈沂水〉曰「劉武帝北伐廣固，登之以望五龍」(頁 2161)、〈巨洋水〉亦曰「其城〔臨胸〕上〔下〕沿水，悉是劉武皇北伐廣固，營壘所在矣」(頁 2208)；後秦之戰的稱謂用語，則如〈濟水〉曰「劉公西征，又命寧朔將軍劉遵考仍此渠而漕之」(頁 657-658)、卷八「劉武帝西入長安，又廣其功」(頁 722)、

⁸⁸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 60。

⁸⁹ 見〔劉宋〕顏延年：〈赭白馬賦并序〉，收入蕭統編，李善注：《文選》，卷 14，頁 622。

⁹⁰ 沈約：《宋書》，頁 367-739。

〈洛水〉曰「劉公西入長安，舟師所屆，次于洛陽」（頁 1296）、同卷又曰「龍驤將軍王鎮惡，從劉公西入長安」（頁 1297），或〈肥水〉曰「劉武帝伐長安所築也，堂宇廳館仍故，以相國爲名」（頁 2687）。除了「劉公」之類中性用語，以上皆是用「劉武帝」、「劉武皇」、「宋武帝」之稱，意謂著承認劉宋政權，顯然與北朝官方史書貶抑南朝政權，直呼其君主名諱的貶抑態度有別。《酈注》既爲私家著作，個人採用劉宋以後慣稱諡稱的方式，也是自然之勢。或可暫且推論，凡使用劉武、宋武等諡號者，應爲酈氏自己的文字，或者經過他改寫的文字。如此說來，前節輯文中 (5a) 條的後半「劉武王西入長安，舟師所保」、(9) 條後半「宋武王入長安，檀道濟、王鎮惡或據山爲營，或平地結壘，爲大小七營，濱帶河險」云云，應不是《西征記》原始的文字。

根據上述引文，可以歸納伐戰爭計有「伐」、「征」和「入」等三種表述方法。其中「征」、「伐」十分常見，學者討論已多，簡言之，從字面的意義來說，「征」取正行之意，孟子將其詮釋爲上伐下，出於懲罰性的軍事行動⁹¹；「伐」取持戈之意，《左傳》將其定義爲鐘鼓堂堂，聲罪致討⁹²。於是征伐便成爲正當性戰爭的專有字詞。王誕 (375-413) 〈伐廣固祭牙文〉曰「使鳴金輟鑿，無戰有壘」⁹³，即言戰爭的目的在於終止亂源，以戰止戰；顧愷之 (345-406) 〈祭牙文〉亦曰「晉命在天，世德重光，烈烈高牙，闐闐伐鼓」⁹⁴，言晉師爲天命所歸，以此出師。兩者都在建立其發動征伐所具的正當性。慕容超 (385-410) 即位後，屢爲邊患，領軍韓諱 (生卒年不詳) 曾諫曰：「今陛下嗣守成規，宜閉關養士，以待賦鑿，不可結怨南鄰，廣樹仇隙。」⁹⁵卻不蒙採納，於是給予晉軍揮師的理由。劉裕在黃河與北魏軍隊僵持之際，更義正辭嚴地回答來使曰：「洛是晉之舊京，而羌姚據之。晉欲修復山陵之計久矣，而內難屢興，不暇經營。司馬休之、魯宗之父子、司馬國璠兄弟、諸桓宗屬，皆晉之蠹也，而姚氏收集此等，欲

⁹¹ 見趙岐注，孫奭疏：《孟子注疏》，卷 14 上，頁 248b。

⁹² 見《左傳》莊公二十九年：「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見〔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卷 10，頁 178b。

⁹³ 見〔晉〕王誕：〈伐廣固祭牙文〉，收入嚴可均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卷 19，頁 1565b。

⁹⁴ 見顧愷之：〈祭牙文〉，頁 2236b。

⁹⁵ 見房玄齡等：《晉書》，卷 128，頁 3180。

以圖晉，是以伐之。」⁹⁶具體說明姚秦的罪狀，表明這是一場以有道伐無道的義戰，藉此取得國際間的認可⁹⁷。

反而是「入」的用法，較少受到關注。從字面上來說，《說文解字》曰「入，內也。象从上俱下也」⁹⁸，乃有由外入內的義涵。引申來說，《春秋》隱公二年曰：「莒人入向。」《注》曰：「弗地曰入。」⁹⁹《左傳》襄公十三年「弗地曰入」《注》曰：「謂勝其國邑，不有其地。」《疏》曰：「謂勝至其地。」《正義》曰：「入謂入其都邑，制其民人，當入之日，與滅亦名。」又《注》曰：「但尋即去之，不為己有，故云：勝其國邑，不即有其土地，如此之類謂之為入。」（頁 554b）由此看來，《酈注》之所以在寫伐南燕時，每用「北伐廣固」，征後秦則皆說「西入長安」，前者意謂東晉伐燕，隨即經略該地，設立郡縣，方能真正統治其地；後者則以一字之貶，指出東晉揮軍後秦所在的關中地區，即使在軍事上取勝，也無法奄有其地，故在義熙十四年（418）攻入長安後，隔年隨即失守，淪入赫連勃勃之手。如此結局，也驗證崔浩（351-450）在劉裕向北魏借道於河之初，即預測曰：

秦地戎夷混并，虎狼之國，裕亦不能守之。風俗不同，人情難變，欲行荊揚之化於三秦之地，譬無翼而欲飛，無足而欲走，不可得也。¹⁰⁰

他深知經北方百年統治的關中地區，人情風俗已變，實非久居江左的劉裕所能掌握，必不能長治久守。因此在筆法上有此細緻的區別。

經由上述討論，可以發現儘管劉裕兩次北伐都以義師征伐，也完成滅南燕、覆後秦的大業，但最後的結果不同，凡此都反映於精微的歷史筆法之中。同時也證成現今所見的劉裕北伐征記，凡出現「宋武」、「宋武王」、「劉宋王」等諡號用詞，不應出自郭緣生、戴延之、裴松之、徐齊民、孟輿、伏滔、伍緝之、邱淵之等從征僚屬的筆下。換言之，酈氏與後來引書者，同樣都會隨文或引或改，甚至將史事完全不註明出處的濃縮改寫，而改編的重要線索就是稱謂的變化。由此可知，發現名字往往不只是名字，往往涉及身分、地位的認同，更傳達出敵我

⁹⁶ 見〔北齊〕魏收：《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29，頁703-704。

⁹⁷ 筆者曾在〈三靈眷屬：劉裕西征的神、聖地景書寫與解讀〉一文，以「從社會互動看劉裕西征」一節，探討劉裕如何在國際互動間取得其北伐的正當性。

⁹⁸ 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卷5下，頁224a。

⁹⁹ 見左丘明傳，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卷2，頁41a。以下已經標出書名和卷數的同書引文僅標示頁數，不另外加註。

¹⁰⁰ 有關北魏對於劉裕借道北伐，北魏君臣間的議論可見魏收：《魏書》，卷35，頁810。

關係的相互抗衡，特別是稱謂的變化，亦可視為國際間實體戰爭的延續，只是改採一種符號象徵的方式持續進行。

五、空間佔領：南北政權的紙上山河

劉裕兩次北伐，既有南朝內部的政治因素，也受到魏晉南北朝長期分裂的政治局勢影響，根據史書統計，南朝總共北伐十七次，分別是：東晉十次、劉宋三次，蕭梁二次，南朝陳二次。其中也有因應十六國北朝入侵者，如苻堅南逼東晉(376-383)；魏孝文帝立志南圖，不惜遷都洛陽¹⁰¹。可見這種南北交戰的局勢，劉裕並非始作俑者，也非最後的終結者，而是在歷史長河中持續進行的環節。這些北伐、南征等戰爭行為背後的思想原則，正是從東漢王朝崩裂以降開始倡議的「春秋」大一統觀念，各個政治集團紛紛為統一的理想而努力。

大一統思想的實踐與鞏固，主要透過疆域的確立、正統的競爭、始祖的追認，以及中原文化的繼承等方式進行¹⁰²。然而「國之大事，在祀與戎」¹⁰³，祭祀與戰爭常是一統天下的一體兩面，用以宣示與鞏固國家主權。因此，筆者曾以神聖地景為切入點，論證劉裕集團藉由征途經過的墳冢、祠墓、靈祠和神廟等地景意象，重新組合成有別於東晉臣民記憶中的華北空間，作為劉裕對彭城先祖的認同和徐兗地方意識崛起的文化象徵，以形成一套兼具空間生產、文化認同、德運承繫與天命歸與的「造宋」話語¹⁰⁴。更進一步探討劉裕西征的英雄形象，如何在南朝形成一套歷史與宗教話語，成為與北方爭取正統的思想資源¹⁰⁵。相對於南朝觀點，王文進從歷史文化學的角度，藉由《洛陽伽藍記》和《水經注》具體論述北方外族政權如何爭取正統立場，包括攀談「民族血緣的關係」、主張「地理

¹⁰¹ 王永平：〈北魏孝文帝之南征戰略及其相關爭議考論〉，《學術研究》2013年第3期，頁108。

¹⁰² 相關文章頗多，如邱久榮：〈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大一統」思想〉，《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93年第4期，頁45-51。

¹⁰³ 見左丘明傳，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卷27，頁460b。

¹⁰⁴ 見拙作：〈三靈眷屬：劉裕西征的神、聖地景書寫與解讀〉，頁29-70。

¹⁰⁵ 見拙作：〈嵩山受壁／長安開霸——劉裕西征與其英雄試煉〉，發表於二〇一三年一月三一四日在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合辦「試煉與苦難：中國宗教與文學的對話」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頁19。

空間的佔有」，再到強調「歷史文化的繼承」¹⁰⁶；陳識仁則試圖剖析北魏史學歷程，說明酈道元曾與史官、傾南文士頻繁交往，形成特殊的交遊網絡，促使其廣涉史地知識，從而在太和改革的時代氣氛刺激下，轉而撰注地理典籍，為北魏帝國提供一幅治國藍圖¹⁰⁷。

從上述例子，可見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大一統實踐，不僅關涉實質地理疆域的爭奪與佔領，特別是洛陽、長安等天下中心，還與書寫空間的話語權密切相關。樂史(930-1007)即在《太平寰宇記·自序》總結前代的經驗說：

臣聞四海同風，九州共貫，若非聖人握機蹈杼，織成天下，何以逮此？自唐之季，率土纏兵，裂水界山，窺王盜帝，至于五代，環五十年，雖奄有中原，而未家六合，不有所廢，其何以興？……自是五帝之封區，三皇之文軌，重歸正朔，不亦盛乎！有以見皇王之道全，開闢之功大。其如圖籍之府未修，郡縣之書罔備，何以頌萬國之一君，表千年之一聖？眷言闕典，過在史官。……撰成《太平寰宇記》二百卷，并目錄二卷，起自河南，周於海外，至若賈耽之漏落，吉甫之闕遺，此盡收焉。萬里山河，四方險阻，攻守利害，沿襲根源，伸紙未窮，森然在目，不下堂而知五土，不出戶而觀萬邦，圖籍機權，莫先於此。¹⁰⁸

他指出，歷經國土分裂，重歸一統之際，不僅要佔有真實地理上的中原，還要重修圖籍、郡書，將萬里山河，四方險阻，攻守利害，沿襲根源等盡收紙上，才是真正地擁有天下。這種「圖籍機權」的文化戰略，實有其根源，可遠溯自《山海經》。據傳，此書作於大洪水之後，帝堯使禹內別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禹作〈禹貢〉，又復命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以紀其珍寶奇物，異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獸、昆蟲，麟鳳之所止，禎祥之所隱，及四海之外、絕域之國、殊類之人¹⁰⁹。換言之，若說〈禹貢〉是藉由區分九州，描繪疆域，以及各個區域內的農業、物產、貢賦，代表一種大一統的社會經濟；《山海經》就是用大地理的視角，經由五方之山、八方之海，囊括天下內外的自然地理。凡此都影射

¹⁰⁶ 詳見王文進：〈北魏文士對南朝文化的兩種態度——以《洛陽伽藍記》與《水經注》為中心的初探〉，《臺大中文學報》第24期（2006年6月），頁115-149。

¹⁰⁷ 見陳識仁：《《水經注》與北魏史學》（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8年），頁1-152。

¹⁰⁸ 樂史：〈自序〉，《太平寰宇記》，頁1-2。

¹⁰⁹ [漢]劉秀：〈上《山海經》表〉，見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成都：巴蜀書社，1996年），頁540。

著中國古代理想的政治格局，更關乎古代政權的合法性，具有濃厚的政治現實意義。

根據記載，酈道元的個性剛厲，行事果決，具有幹才，曾被派予巡行查驗大陽蠻一萬七百戶歸附置郡之事¹¹⁰。其生平經歷中需要特別注意者，為少時曾隨從魏孝文帝，參與太和時期的北巡和南巡，故在《酈注》中不時提及太和中事，如卷三〈河水〉提到：

余以太和十八年從高祖〔孝文帝〕北巡。（頁 235）

同篇〈楨陵縣〉下，又記曰：

余以太和中為尚書郎，從高祖北巡，親所逕涉。（頁 237）

另外同書卷九〈清水〉亦提到：

太和中，高祖孝文皇帝南巡，親幸其〔比干〕墳，而加弔焉。刊石樹碑，列于墓隧矣。（頁 816）

舉凡太和間遷都置郡、太極殿、講武場、高祖陵、祗洹舍，都一一記載。酈道元對於魏孝文帝逐漸明確的南征戰略意圖，以及日益強烈的統一願望，應該知之甚深。然而出乎眾人意料之外，這位地理專家卻在該書的〈序〉言：

余少無尋山之趣，長違問津之性，識絕深經，道淪要博，進無訪一知二之機，退無觀隅三反之慧。獨學無聞，古人傷其孤陋，捐喪辭書，達士嗟其面牆。默室求深，閉舟問遠，故亦難矣。然毫管闖天，歷筭時昭，飲河酌海，從性斯畢。竊以多暇，空傾歲月，輒述《水經》，布廣前文。（頁 1）

自表毫無尋山問水的興趣，也不見政治地理的見識，那麼何以可見其「治國藍圖」的經世意圖？倘若考量北魏嚴峻的史學環境，以及他兩次免官的遭遇，該書大約動筆於第二次免官之暇餘，故其政治意圖、經世思想，恐怕不得不有所隱藏。由此再回頭重看酈注〈序〉的開篇，其曰：

《易》稱天以一生水，故氣微于北方，而為物之先也。《玄中記》曰：天下之多者，水也。浮天載地，高下無所不至，萬物無所不潤。及其氣流屈石，精薄膚寸，不崇朝而澤合靈宇者，神莫與并矣。是以達者不能測其淵沖，而盡其鴻深也。（頁 1）

酈氏採取引經據典，意表言外的方式，舉《易》之「天以一生水」，證成水作為

¹¹⁰ 見魏收：《魏書》，卷 89，頁 1925-1926；卷 101，頁 2247。

天地萬物生養的開端，並宣稱「氣微于北方，而為物之先」，將話語由水氣連結至北方水德。孝武帝改革之時，正是以晉魏相承，由金轉向水，即是以水德相繫。然後再次引《玄中記》，大談水「浮天載地」，無所不包的各種特性。由此可見酈氏之所以選擇水文作為展現其「圖籍機權」的載體，其企圖與框架絕對是超越昔日《山海經》、《地理志》、《尚書》、《本紀》、《職方》等略而不周的地理著作。

另一方面，也可從酈氏對當時圖經與紀行之作的批評來觀察。他接著批評說：

今尋圖訪蹟者，極聆州域之說，而涉土遊方者，寡能達其津照，縱仿佛前聞，不能不猶深屏營也。（頁 1）

根據學者研究，目前最早的圖經記載來自《華陽國志》，就是東漢孝桓帝時期的《巴郡圖經》，從其引用的零星片段，可知體例已趨於完善，說明當時確實存在著某種搜集王朝疆域地理資料的傳統；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圖經發展情況較不明朗，直到隋唐時期才逐漸普遍¹¹¹。從酈氏之言，亦可證明此一傳統在政權分裂的魏晉南北朝，確實受到很大的限制，從而成為不易企及的理想；其次則是本文討論的行記，酈氏亦認為外來者很難深入其要，儘管參考前人記載，卻不免無所適從。由此再回到劉裕征記的討論，《酈注》中常常辯駁郭緣生和戴延之筆下征記書寫的謬誤，如狐行之說¹¹²、踐土之治¹¹³、遂明壘¹¹⁴、殷城¹¹⁵、白超壘¹¹⁶、大梁亭¹¹⁷等。凡此出自訪查地理真相，考證歷史變遷的書寫方式，本為注疏性著作常見者，其實事求是的態度向來受到學界肯定。但若對照《酈注》中對郭緣生、戴延之的某些批評，則可察覺一些弦外之音，譬如酈氏在言及郭緣生時常說：

緣生從戎行旅，征途訊訪，既非舊土，故無所究。（頁 1373）

按緣生此記，雖歷覽《史》、《漢》，述行涂逕見，可謂學而不思矣。
（頁 1636）

¹¹¹ 見潘晟：〈圖經源流再討論〉，《中國地方志》2010年第1期，頁25。

¹¹² 見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楊橋驛復校：《水經注疏》，卷1，頁10-11。

¹¹³ 見同前註，卷5，頁383。

¹¹⁴ 見同前註，頁416。

¹¹⁵ 見同前註，卷9，頁843-844。

¹¹⁶ 見同前註，卷16，頁1368。

¹¹⁷ 見同前註，卷22，頁1889。

始知緣生行中造次，入關經究，故事與實違矣。（頁 1376）

酈氏強調郭緣生的他者身分，批評他對中原領土的知識停留在書面歷史，與現實狀況有所距離。另外，在卷二十五〈泗水〉對戴延之的批評如下：

泗水又左會南梁水。……戴延之《西征記》亦言：「湖陸縣之東南，有涓涓水，亦無記于南梁，謂是吳王所道之瀆也。」余按：湖陸西南，止有是水。延之蓋以《國語》云：「吳王夫差起師，將北會黃池，掘溝于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于濟。」¹¹⁸以是言之，故謂是水為吳王所掘。非也。余以水路求之，止有泗川耳。蓋北達沂西，北逕于商、魯，而接于濟。吳所浚廣耳。非謂起自東北受沂，西南注濟也。假之有道，非吳所趣。年載誠眇，人情則近，以今忖古，益知延之之不通情理矣。（頁 2126-2127、2129-2130）¹¹⁹

酈氏辨證歷史記載與實地考證間的關係，強調古今傳承而變化的規律，由此批評戴延之「不通情理」。儘管每每批評郭緣生《述征記》昧於現實，酈氏亦常用「戴延之所云……」¹²⁰、「戴延之所謂……」¹²¹等句引證戴延之的說法，多過於嚴厲的指摘，但字裏行間還是流露出在地者的優越感。由此或可說明酈氏原本是南方文學、著作的愛好者，但也正因如此，他十分敏銳地觀察到南朝不僅是揮軍北伐，企圖收復實際空間的中原版圖，也製造大量經行山東、河南、關中的征記，藉此重新連結南方與北方空間記憶的「圖籍機權」。然而遭逢孝文帝南征而逝，北魏國勢日漸衰頹，於是酈氏展開反空間的佔領方式，即以兼容並蓄，採取上善若水的姿態，大量蒐集南方地理著作，特別是這些北方征記，利用引述、糾正，以及將其貶抑為北方山河的過客、旅者、征人等方式，藉此重新取回紙上山河的空間權力。

¹¹⁸ 《國語》卷十九〈吳語·吳晉爭長未成句踐襲吳記〉曰：「吳王夫差既殺申胥，不聽於歲，乃起師北征。闕為深溝，通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於黃池。」文字與《酈注》略有差異。見左丘明撰，〔三國〕韋昭注：《國語》（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 219。

¹¹⁹ 標點已經筆者調整。

¹²⁰ 如《水經注》卷七〈濟水〉云：「戴延之所云：『新築城周城三百步，滎陽太守所鎮者也。』」見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楊橋驛復校：《水經注疏》，頁 650-651。

¹²¹ 如《水經注》卷四〈河水〉云：「關之直北，隔河有層阜，巍然獨秀，孤峙河陽，世謂之風陵。戴延之所謂風埏者也。」（同前註，頁 319）《水經注》卷八〈濟水二〉云：「濟水又北，汶水注之，戴延之所謂清口也。」（頁 723）

六、結論

戰爭爲人類社會共同的經驗，然而其被言說與認知的方式卻大相逕庭，早在先秦時期，即已體認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形成非常豐富的戰爭語彙和記事傳統。儘管《說文解字》解釋「戰」字曰「鬥也。从戈單聲」¹²²，只是形象化地模擬對戰時舉戈相鬥的形貌和聲音。事實上，先秦時代對於戰爭的性質，已有精緻入微的區分，如《左傳》莊公十一年曰：「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¹²³同書莊公二十九年：「凡師有鍾鼓曰伐，無曰侵。」¹²⁴《左傳》二例表面上都是從佈陣、鳴金擊鼓與否等戰術來爲戰爭命名，其實寓含對於戰爭之譎與正的論斷；至於如《公羊傳》莊公三十年曰：「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爾。」¹²⁵或者《孟子·盡心下》曰：「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¹²⁶或同書〈告子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¹²⁷，則是從戰鬥雙方的身分和地位界定戰爭的正當性。透過如此細緻的戰爭語彙，不僅提供考察當時戰爭文化的線索，彰顯出對於戰爭幽微的省思，更提醒在面對中國歷史中的戰爭用語時，也不得不小心翼翼。

儘管爲了學術上的統一與方便，不得不繼續使用「戰爭」一詞，但從記體小說《述異記》以神啓式的語言，將劉裕北伐行動定義爲「有征無戰」的義戰，由此即可推知陳師列陣、舉戈戰鬥的場面，原本就不是此一軍事行動的論述重點，必須隨其語境，正名爲「征戰」、「征行」等，才能清楚地傳達其有別於「軍戎」名題的內涵，並且理解漢魏南北朝並不缺乏金戈鐵馬、從軍甘苦的戰爭詩文，「征賦」、「征記」依然有其獨特地位，可以成爲一種獨立的名題。特別是後者有別於詩、賦的代言與抒情，重在具體移動空間的記錄，也旁及記述者本身對於地方知識、歷史傳說與鄉土趣味的探求，就是從征人的眼光，用質樸的語言報導既陌生又熟悉的北地地理、歷史和風俗，爲戰爭提供見證式的話語。人們對

¹²² 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卷12下，頁630b。

¹²³ 左丘明傳，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卷9，頁152a。

¹²⁴ 《左傳》莊公二十九年：「夏，鄭人侵許。凡師有鍾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見同前註，頁178b。

¹²⁵ 見〔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注疏》（《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卷9，頁110a。

¹²⁶ 見趙岐注，孫奭疏：《孟子注疏》，卷14上，頁248b。

¹²⁷ 同前註，卷12下，頁218a。

於戰爭的認識，往往奠基於戰爭的詮釋，以及如何合理化暴力等問題；戰爭的記憶與遺忘，也常是另一種戰爭形式的延續。換言之，劉裕北伐的行動，並不隨著戰事的落幕而終止，透過大量征記的書寫與傳播，為北伐征人與南方軍民提供華北故土的諸般消息，更傳達此一戰役的必要性與正當性，甚至塑造收復兩都的英雄神話，為劉裕完成個人造宋野心的政治話語，更為後來南朝一系列的北伐行動，提供正當化的理由¹²⁸。

有趣的是，隨著個體與文學的自覺，中國文學乃是多音並存者，由東漢以頌美為主的征賦，發展到東晉袁宏的〈東征賦〉和〈北征賦〉，不僅具有月旦人物、評價功過的社會影響力；或如謝靈運〈撰征賦〉更直接在劉裕西征的背景之下，一方面肯定揮師北伐之功，另一方面不斷從歷史教訓和祖德家風，告誡功臣與亂臣往往僅有一線之隔，而「征」的大義即寓於此。

更值得注意的是，北方士人如酈道元等人，在其博大精深的地理著作中，兼容並蓄地容納諸多南方地記，甚至將劉裕北伐的征記，轉化為一種記憶的戰爭。在此意義下，戰爭從未結束，只是從實體的軍事現場進入符號的象徵場域。魏晉南北朝三百多年間，民族、血統、政統的戰爭持續不斷地進行，帶來生民塗炭與地方破壞，道統與文統的戰爭亦隨著南北交流展開激烈的論戰，所幸這種紙上競爭的無形戰爭，反而促使南北文化進行深刻的反省與沈澱，積蓄再次出發的動力，以待大唐文化的旭日東昇！

¹²⁸ 參見拙作：〈嵩山受壁／長安開霸——劉裕西征與其英雄試煉〉。

見與不見的戰爭

——論記體與賦體及劉裕北伐

劉苑如

東漢開始，出現大量征行之作，尤以士大夫在宴集場合中朗誦的賦體，在文士間產生競題現象。本文集中探討東晉末年，隨著劉裕(363-422)對南燕、後秦等北方異族出征，接連告捷，應運而出的眾多作品，特別是謝靈運的名篇〈撰征賦〉；還有一系列劉裕征行記，一律以「征記」為名，僅大量保留在稍後的地理圖籍著作。

本文的主要關懷有三：其一有別於當代著重「文」（如詩、賦）而輕「筆」的研究趨勢，這些征記不應僅被視為歷史地理著述，也是深有所托的寄寓之作，其文學的秘密就隱藏於「筆」法之中；其二探討征賦與征記「名題化」的現象。在「征賦」名家輩出的時代，這些慰勞劉裕征秦之師所作「征記」何以異軍突起？其三徵引與輯佚的問題：這些征記既然透過徵引倖存於史籍或類書中，本文將以《水經注》所引為例，探問此中是否發生了怎麼樣的質變？最後擬用「戰爭之框」的概念來說明此一「定調」與「再定調」的形塑過程，重新審視劉裕北伐戰爭在後來南、北正統論中的運用，思考戰爭如何從實體的軍事場域進入符號的象徵領域。

關鍵詞：劉裕 征記 征賦 名題競爭 南北正朔

Visible and Invisible War: Records, Rhapsodies, and Liu Yu's Expeditions to the North

LIU Yuan-ju

From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25-220), there appeared numerous literary works on expeditions, especially rhapsodies the literati recited at banquets, in a competitive atmosphere.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Liu Yu's (363-422) victorious northern expeditions against the Southern Yan (398-410) and Later Qin (384-417), at the end of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317-420). His feats are reflected in rhapsodies, particularly Xie Lingyun's (385-433) famous "Rhapsody on an Expedition", but also in a series of prose accounts, all of which were entitled "expedition records". A large number of these is preserved in later geographical and cartographical treatises.

This article makes three observations. First, in contrast to the emphasis in contemporary research on verse literature, the expedition records should not be regarded only as historical geography, but examined for the rich metaphorical value written into them. Second, the process by which the expedition emerged as a topic of composition for rhapsodies and records should be examined. Rhapsodies were composed to extol Liu Yu's expedition against the state of Qin, but why was there also a sudden surge of "expedition records"? The third observation refers to the problem of citing and editing works extant only in fragments. Using the *Annotated Classic of Waterways (Shuijing zhu)*, this article explores whether and how the materials were adapted and altered as they were incorporated into historical and encyclopedic works. Finally, this article uses the concept of the "frame of war" to explain how Liu Yu's campaigns to the north were "keyed" and "re-keyed" for use in debates over the legitimacy of the regimes in the South and North, evaluating how war moved from the military sphere to the realm of the symbolic.

Keywords: Liu Yu account records on expeditions
rhapsodies on expeditions competition in topics
legitimacy betwee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徵引書目

- 小尾郊一著，邵毅平譯：《中國文學中所表現的自然與自然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 孔安國傳，孔穎達疏：《尚書正義》，收入《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
- 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收入《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
- 王文進：〈北魏文士對南朝文化的兩種態度——以《洛陽伽藍記》與《水經注》為中心的初探〉，《臺大中文學報》第24期，2006年6月，頁115-149。
- 王永平：〈北魏孝文帝之南征戰略及其相關爭議考論〉，《學術研究》2013年第3期，頁105-113。
- 王東洋：〈魏晉南北朝巡行與考科關係探討〉，《河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5卷第6期，2007年12月，頁11-16。
- 王弼、韓康伯注，孔穎達疏：《周易注疏》，收入《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
- 王謨：《漢唐地理書鈔》，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 王讜撰，周勛初校證：《唐語林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 司馬光：《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
- 左丘明傳，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收入《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
- _____撰，韋昭注：《國語》，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何休解詁，徐彥疏：《春秋公羊注疏》，收入《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
-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 李昉等編：《太平御覽》，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年。
- 李德輝：《唐代交通與文學》，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
- _____輯校：《晉唐兩宋行記輯校》，瀋陽：遼海出版社，2009年。
- 汪宏倫主編：《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4年。
- 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 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 邱久榮：〈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大一統」思想〉，《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93年第4期，頁45-51。
- 封演撰，趙貞信校注：《封氏聞見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
- 洪興祖撰，白化文等點校：《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 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34年。

- 祖沖之：《述異記》，收入魯迅：《古小說鈎沉》，香港：新藝出版社，1967年。
- 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成都：巴蜀書社，1996年。
- 曹植撰，趙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
- 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洪葉文化事業公司，1999年。
- 郭英德：〈論中國古代文體分類的生成方式〉，《學術研究》2005年第1期，頁122-127。
- 陳恬儀：《謝靈運仕隱曲折研究》，臺北：輔仁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08年。
- 陳識仁：《〈水經注〉與北魏史學》，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8年。
- 陶宗儀：《說郛》，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年。
- 陸雲撰，黃葵點校：《陸雲集》，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
-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 楊牧：《文學知識》，臺北：洪範書店，1986年。
- _____：《隱喻與實現》，臺北：洪範書店，2010年。
- 楊銘：〈論劉裕北伐後秦之戰及其歷史影響——魏晉十六國時期民族戰爭的個例研究〉，《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2期，頁49-52。
- 趙岐注，孫奭疏：《孟子注疏》，收入《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
- 趙燕：〈從敘事到議論——「記」體散文體制規範形成探析〉，《浙江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1卷第2期，2012年6月，頁220-225。
- 劉苑如：《身體·性別·階級——六朝志怪的常異論述與小說美學》，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年。
- _____：〈嵩山受壁／長安開霸——劉裕西征與其英雄試煉〉，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合辦「試煉與苦難：中國宗教與文學的對話」國際學術研討會，2013年1月3-4日。
- _____：〈三靈眷屬：劉裕西征神、聖地景書寫與建構〉，收入劉石吉等編：《旅遊文學與地景書寫》，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人文研究中心，2013年。
- 劉湘蘭：〈論賦的敘事性〉，《學術研究》2007年第6期，頁128-133。
- 劉義慶著，余嘉錫疏：《世說新語箋疏》，臺北：華正書局，1984年。
- _____：《幽明錄》，收入魯迅：《古小說鈎沉》，香港：新藝出版社，1967年。
- 劉勰撰，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
- 劉德杰：〈論東漢外戚幕府文學的興起與繁榮〉，《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5期，頁43-48。
- 樂史：《太平寰宇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 歐陽詢撰，汪紹楹校：《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 潘晟：〈圖經源流再討論〉，《中國地方志》2010年第1期，頁24-29。
-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注疏》，收入《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
- 鄭毓瑜：《性別與家國——漢晉辭賦的楚騷論述》，臺北：里仁書局，2000年。

- 蕭統編，李善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 謝靈運撰，顧紹柏校注：《謝靈運集校注》，臺北：里仁書局，2004年。
- 魏收：《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 魏徵等：《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34年。
- 嚴可均編：《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
- 蘇瑞隆：〈論謝靈運的〈撰征賦〉〉，《文史哲》1990年第5期，頁48-52。
- 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年。
- 鮑遠航：《〈水經注〉文獻學文學研究》，北京：首都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博士論文，2004年。
- 大西陽子：〈南宋期の紀行文に於ける時空間表現をめぐって：表現行為としての記録〉，《お茶の水女子大學中國文學會報》第8號，東京：お茶の水女子大學中國文學會，1989年4月，頁23-38。
- 小尾郊一：《中國文學に現われた自然と自然觀》，東京：岩波書店，1962年。
- 森鹿三：〈劉裕の北伐西征とその從軍紀行〉，《東洋史研究》第3卷第1號，京都：東洋史研究會，1937年10月，頁28-39。